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

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 国家联盟

卡尔·考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出版者說明

这是考茨基在1915年2月写的一本小册子。考茨基那时已經彻底墮落成为馬克思主义的叛徒，他在这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小册子中，大肆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殖民政策辯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背叛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場辯护，宣揚他的所謂“超帝国主义”理論（帝国主义各国可以联合成一个統一的国际組織，这个世界托拉斯組織将能消除各国間的冲突、战争和軍备竞赛，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經濟危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就是其中比較著名的一本。

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把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国家（第1章）；第二阶段是帝国主义国家（第2—5章）；第三阶段是国家联盟（第6章）。其中論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战争的根源和实现持久和平的办法，資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和途徑，民主和专政，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策略等等。

考茨基认为，当前的世界大战不是純粹的帝国主义战争，它“是在不存在任何帝国主义爭端的时候爆发的”。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資本主义的产物，它体现在工业国征服和兼并越来越多的农业地区的要求中，但殖民政策本身，“从其最重要的現象来看，不是以帝国主义为根源的”。战争的产生是由于資本主义經濟的进一步发展“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已不再可能了”，它的最主要的根源是“軍备竞赛”。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爭端都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来消除的。取得持久和平的最好方法是实现国际社会主义的四条和平綱領，即：1. 反对任何暴力兼并，实现民主；2. 裁减軍备；3. 签订貿易协定；4. 尽量降低关税。这个綱領“是从整个无产阶级运动长远的和共

同的需要以及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资本主义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发展的途径“最好不用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用和平民主的方法”把“各个具有同等权利的国家联合成国家联盟”，国家联盟是“资本主义赖以达到其最后的、最高级的形态所需要的”，它形式多样，伸缩性强，前途远大，“最终可以一直发展到世界联盟”，而无产阶级则将在这个阶段上夺得权力，这对劳动群众来说，是一条牺牲最少、痛苦最小的道路。

这本小册子出版后不久，列宁就在《第二国际的破产》和以后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两文中对其中的主要谬论进行了驳斥。列宁指出：“考茨基拿着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新纪元的希望，来替机会主义者和正式的社会民主党违背巴塞尔决议的庄严声明而在目前风暴时期倒向资产阶级和放弃革命策略（即无产阶级策略）的行为作辩护！”他“要想从各国资本联合成为统一的国际整体的事实中，得出裁减军备的经济趋势的结论，就等于用小市民希望阶级矛盾和缓的善良愿望来代替阶级矛盾的真正尖锐化”；“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慰工人，为了使他们跟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妥协，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讲给工人听，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妥协”。列宁指出考茨基是在执行为压迫阶级效劳的牧师的职能，“当争夺强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就来劝导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说，战争是可怕的东西，裁减军备才是好事。这样做和这样做的结果完全像基督教的牧师从讲台上劝导资本家说，博爱 是上帝的教诲，是灵魂的所向，是文明的道德规范。考茨基称为导致‘超帝国主义’的经济趋势的那些东西，实际正是小资产阶级劝导金融资本家不要为非作歹的忠言”。这位“牧师劝导资本家采用和平民主的办法，并且说这是辩证法”；这位“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从

而使他們忍受这种統治，使他們放棄革命行动，冲淡他們的革命热情，破坏他們的革命决心”。在这本小册子里，“考茨基把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論，歪曲成了最齷齪的僧侶主义”。（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00—209 頁和第 22 卷第 281—291 頁）

本书是根据德国紐倫堡弗兰克印刷公司 1915 年德文版譯出的。

目 次

一	关于民主和关于民族国家的若干问题.....	1
二	帝国主义国家的必然性.....	11
三	国家扩张要求的原因.....	19
四	帝国主义的各种类型和目标.....	34
甲	不列颠国家联盟.....	34
乙	东印度.....	40
丙	非洲.....	48
丁	中国.....	54
戊	土耳其.....	57
己	世界大战.....	64
五	贸易协定.....	70
六	关税同盟和国家联盟.....	76

一 关于民主和关于民族 国家的若干问题

很不幸，这样的时期再一次地又来到了；即为了阐述明白起见，必须从最基本的东西讲起。有一些同志认为，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一切，现在已经证明是骗人的玩意儿，或者已经过了时，只符合那种不再存在的情况，现在只能作为“自由主义的遗产”而属于“古董仓库”里的东西了。

帝国议会党团8月4日声明中所宣布的关于“每一个民族都有民族独立的权利”的原则，也被说成是这种过了时的观念之一。

这个原则现在遭到党内同志的攻击。关于这个原则，我们必须弄清楚：它在行将到来的和平谈判中将起巨大的作用。

温尼希同志在12月8日凯姆尼茨《人民呼声报》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个原则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原则，同其他某些东西那样它是工人运动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精神武库中接收过来的”。他还认为，这种要求同科学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社会主义既不能把划分目前的疆域当作世界政治现状的基础，也不能把每个民族要求彻底独立的绝对权利当作世界政治现状的基础。只要社会主义能够影响战后的新秩序，那末社会主义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各处一样，也必须根据总的发展趋势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确定其计划的方针路线。

但是在今天，国家制度毫无疑问地是朝着大国的方向发展的。”

温尼希没有说明，我们根据“总的发展趋势”想要建立的这种大国应该是怎么样的国家，但是显而易见，这该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家。

这种看法在右派以及在左派那里，在卡尔斯鲁厄以及在哈勒都

博得喝采。卡尔斯魯厄《人民之友报》以贊同的态度轉載了哈勒《人民报》的一篇文章。其中包括这样一段：

“拉薩尔在他的关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小册子里說，如果没有独立的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有民主。为什么不可能，这却无法看出来。为什么像德意志帝国——其中除了德意志本族人之外还有波兰人、丹麦人、法兰西人——这样一个国家就不能加以民主管理？即使一千二百万德意志—奥地利人不参加进来，为什么目前不是清一色民族組成的德意志帝国就不能成为民主国家？今天使得全国公民完全平等的民主制度未能实现的，不是民族差别和矛盾，而是阶级差别。”

这位哈勒方面的作者还认为，拉薩尔 1859 年的看法并不因而就是荒謬的。这种看法当时是有理由的，因为德国和意大利在当时都需要建立統一的国家。但是，从那以后，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也大大地提高了：

“其发展規模是如此巨大，以致于对资本主义說来民族国家的范围已变得太狭窄了。多年来，国家的追求世界大国地位，一直是政策的巨大动力。这就是說，每一个大国都力求越出它的国界向外扩张，必須向外扩张，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經濟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大已不再可能了。”

在最后一句話里，作者显然忘記在“已不再可能”这几个字前面加上“在迄今为止的国境之内”或“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等字样，不加上这些字，結論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所有这些言論都包含了許多正确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把其中隱藏着的重大謬誤之处不留神地一并接受过来的危險也就越大，而这些謬誤之处可能給我們的宣傳造成严重的損失。

为了把它們揭示出来，我們必須进一步地回溯一些来由，并且首先来討論一下民主的实质。

民主的历史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人类最初的組織就是群体；这些群体有时根据傳統和习惯，有时通过自由选出的有經驗的領袖作出的决定，有时依照聚会的群体成員所通过的決議来管理其事务。

不言而喻，所有群体成员都能互相交谈，都说同一种语言。有时某些从战争中俘虏来的妇女说另一种语言，然而她们却恰恰并不构成民主的成份。民主所及的范围也就是共同语言所及的范围。这就是说，所有在同一个民主公社里的人都说同一种语言。但是反过来，并不是所有说同一种语言的人都联合在一个公社里。后面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是不存在的。

当阅读和书写还不曾发明，不曾被群众所掌握，而且交通工具还不发达的时候，民主只能通过口头的交谈来实现。这样就给各个民主公社的地域和人口划定了它们所无法逾越的界限。人民大会是最高一级的民主；公社的地域不能扩大到其成员无法经常参加人民大会的那些地方。另一方面，公社的人口也不能多得使某一部分成员无法参与议事的程度。因此最初的民主是越不出村社和城邦的范围的。

在这个阶段上，一个较大国家的形成，一般说来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径：即一个特别强大或条件优越的公社——可能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巩固的城邦——征服了另外一些部落或公社并使它们纳贡，但同时被征服者一般说来仍然保持自己管理一切内部事务的权利。公社的民主就可能如此地成为国家里专制主义的基础，正像东方今天还往往存在的情况那样。恩格斯早就指出过，俄罗斯的专制主义是立足于村社民主的基础之上的。

由于每一个公社都继续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因此联合在一个国家里的各个公社也就没有必要都说同样的语言。只须每个公社里有一两个代表懂得统治者的语言就够了。在各个民主组织的范围内流行着共同的语言。把它们统一在一起的专制制度扩展到各种不同语言的地区。因此在这个阶段上，一个国家的扩张只受到居统治地位的公社的力量限制。但是它并非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系手段。唯有居统治地位的公社的作战力量才构成国家，而国家又能凭借这种力量来迅速地大举扩张。一旦这种力量消失，那么这个国家也许就会迅速瓦解。甚至在近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类国家扩张的实例。俄国从十七世纪以来之迅速向东西伸展，以及英国在十八世纪之迅

速取得大部分东印度，如果不是这样一种公社的原始民主在这里和在那里还居统治地位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原始民主之上，有一种作为国家组成因素的军事强制统治高高地居于支配地位。俄国的面积从而变得等于欧洲的两倍以上；不列颠帝国主要也是由于印度，才能使它的人口几乎与欧洲相等。欧洲有四亿四千三百万人口，不列颠帝国大约有四亿一千八百万人口，其中四分之三在东印度。俄国大约包括一百五十个民族，印度语言的种类则比这还多。

然而在这两个庞大的帝国形成的同时，已经产生了越出公社或村社的领域而在一个较大的国家内实行民主从而用现代民主来替代原始民主的物质条件。这是由于交通事业和印刷事业的发展以及阅读和书写的普及化而实现的。现在已经产生了一种对懂得同样语言的一切人毋须发生个人接触而讲话的手段。在同书面方式，尤其是印刷方式相比之下，口头方式的相互沟通的意义越来越小了。不仅对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上层分子，而且对于运用同样语言的全体群众来说，现在已经形成一种紧密的精神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又进而凭借共同的书面语言而使复杂的方言退居次要地位，从而使得使用共同语言的共同体的扩大和紧密方面又有进展。同时，拥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和固定的关卡疆界的现代大国也形成了。它首先加强了国家中央权力机关的权力，这种权力成为一种绝对的权力。但是由于交通事业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全国的居民越来越能够了解中央权力机关作什么和不作什么，对之加以讨论和批评。同时，对于每个人来说，中央权力机关的这种行为也越来越变得重要起来，国家权力的范围也扩展了。因而迫切要求通过由群众选举产生并受群众监督的议员和代表制度对中央权力机关的行为施加影响。这样就发展出现代民主制度，它的主要特点是议会制度、新闻事业以及遍及国家整个领域的巨大的政党组织。对这些制度进行批评，这是再容易也没有的事了；而要在现代民主中把这些制度剔除出去，则又再没有比这更不可能的了。尤其是议会制度，不断地遭受风暴的打击，而且自从有这种风暴以来，就一直有这种不断被人重复的断言：议会制度已经

过时了，應該代之以一种更加完美的民主制度。但是如果仔細考察一下，这种代替物总是表現为一种原始民主形式。这一点也适用于由人民直接制定法律以及它的更加烈性的变种——群众性的罢工。这两种形式虽然能够發揮意义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只能作为議會制度的补充，或者在議會制度一旦发生故障时作为其促进力量；然而它不能代替議會制度。議會制度的最坚决反对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彻底到甚至願意重新恢复公社制度，使国家变成一群主权公社，以便摆脱議會制度。他們由此而十分明显地表明，那种想把代議制排斥在外的民主是何等原始，他們的打算是何等反动。

正如一切社会活动一样，政治的官能是語言。只有当我掌握我的党的語言时，我才能对我的党发生影响；我愈是熟练地掌握其語言，我就——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愈加能够对它發揮影响。如果一个国家里說着不同的語言，那末一位政治家、一家报纸、一个政党几乎不可能对全体人民讲话，而只能对一小部分人讲话。甚至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国际性政党在奥地利因而就分裂成了不同的党组织，它們彼此之間无法了解，其中每个組織只能对整个国家里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发生影响。

我們在哈勒的党组织的这位工作人員問道，为什么拥有波兰人、丹麦人、法兰西人的德国不能实现人人的充分民主。但是一位波兰政治家，或者一家波兰杂志，或者一本波兰书籍，無論用波兰語言向我們說得如何娓娓动人，令人信服并且含义丰富，它們也許会对德国境外的波兰人发生影响，但是决不能对德国人民发生影响。民主的实质毕竟是存在于对人民的影响以及通过人民所發揮的影响之中的。

在一个拥有統一民族的民主国家里，一切政治家和政党只有这样一个可能性来扩大他們对国家的影响，即通过在人民中間宣傳他們的主張，通过这种主張爭取拥护者。在多民族国家里，任何人不能对全体人民发生影响，而且在数目有限的讲同一語言的居民中間进行宣傳时，任何人都会发现有一个限度。这种居民人数愈多，他的宣傳就愈有前途，他在国家里的权力也就愈大。所以，在多民族国家

里，由于民主的发展以及各党竞相宣传其主张的斗争，不同民族的各个政党组织彼此都努力（尤其是通过相应的学校组织）在全国居民中影响其本民族的——也即其语言共同体中尽量多的人。由于一个国家内部诸民族之间的斗争，民主就遭到了窜改和支解，并且在与国家中央权力机关相形之下受到了削弱。

这里还要考察民主的另一方面。民主不仅意味着由人民来掌握国家权力，而且意味着每个人在国家权力面前的平等。这种平等在多民族国家里也受到了侵犯。每个现代国家都需要统一的行政，因而为此也需要统一的语言。没有一个现代国家没有一种至少必须为高级政府机关所理解和掌握的国语。美国包括许多民族，它甚至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然而它有统一的国语——英语。甚至由于共戴一君制而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联合起来的两个多民族国家，都各有其国语——匈牙利的国语是马札尔语，奥地利的国语实际上是德语。仅仅有不完善的国语，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不是很有利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一个小国可以有两种官方语言。一个国家里有多种国语，这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显而易见，一个国家的语言的多样性将严重影响民主和平等。在这种国家里，会讲国语的人常常比不会讲国语的人有利得多。如果法官和律师不懂得被告的语言，那末被告的处境是很不利的；一个学生如果只能很吃力地勉强说说在听课和应考时所使用的语言，他的处境也是十分不利的。一个官员不能掌握政府机关所用的语言，就会被免职。议会里的一个发言者如果说一种他并不精通的语言，或者说一种只为一小部分在场的人能听懂的语言，他的作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作为国家里的个别的外族人，他不得不忍受这种情况。作为国家里的一个强大民族的成员，他就会对于个人由于民族原因而受到的歧视表示愤怒。民主的感受愈强烈，那末要争取他的民族在国家里享有平等地位的要求也就愈强烈，于是，民族反对派就会同国家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发生矛盾。

但是阶级斗争将由于民族之间的这种敌对而受到削弱。如果一

个民族在国家里受到另一个民族的侵害，那末这个被压迫民族的各个阶级在压迫者面前就十分容易团结起来。阶级矛盾就会被抹煞或者被窜改，根本不表现出来，或者以一种被歪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同一个阶级的成员之间的团结，尤其是被剥削阶级的成员之间的团结就会受到影响，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感情大多本来就不像剥削者那样形于外的。

这一切困难在全国所有人民群众都讲同一种语言的地方，即在民族国家里，是可以避免的。在那种在现代民主制度产生以前就已经形成的旧的多民族国家里，这些困难将由于居民的习惯和适应性而有所减弱，这种居民还没有体验过民族国家的好处。这些困难也会变得完全无法容忍，如果用强力把这样一种异族分子并入一个国家的话：这些异族分子已经使现代民主制度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要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是与那种要建立现代大国民民主制度的努力同时出现的，而且是与它十分密切地联系着的。那种认为奥地利只要有民主就能够生存的看法，是再荒谬不过的了。使奥地利复兴的一切民主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这样一个想法出发的：即想使这个统一的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联盟。这也就是俄国边疆地区各民族所要求的民族自治。在每个这样的民族国家里，才可能有完全的、不单单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和有效的民主。

社会民主党从资产阶级民主中间接受了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当然，我们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我们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认为民主似乎是什么微不足道或者完全多余的东西。无产阶级作为国家里最低层的阶级，除了通过民主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取得自己的权利。我们只是没有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似乎一旦争取到民主，无产阶级仿佛就已经取得了它的权利。这只是无产阶级据以争取自己的权利的一种基础。无产阶级并不在民主制度下停止解放斗争，而只是采取其他的斗争形式。

恰恰是对无产阶级来说，而不是对资产阶级来说，民主是生存的一种必要条件。资产阶级抛棄了目前高度的民主理想，从而也抛棄了

民族国家的观念。资产阶级今天对国家理想的追求已经越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他们把这种“自由主义的遗产”抛进了“古董仓库”。但是这确实不能成为我们也这样做的理由。我们不应该这样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即认为既然资产阶级“总的发展趋势”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接受这种趋势。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同样也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无产阶级必须遵循这种趋势，不管这种趋势是否与资产阶级的趋势不同，或者与它根本相反。

当然，以上所谈到的只是人们必须理解并且必须有意識地遵循的趋势，不是绝对的死公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有些人对千篇一律地运用这个公式提出了批评，但他们却认为这种趋势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温尼希和哈勒的那位同志就是这样做的。

首先，不能把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理解为一种要把讲同样语言的一切人全部组成一个共同国家的绝对义务。民族国家的观念只是说：如果在国家里全体人民群众都说同样的语言，那末民主就能最美满地发扬和最完美地实现。在这个国家之外，也完全可以建立另外一个讲同一种语言的国家。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违背了民主的要求呢？如果在美国，英语是国语，在巴西，葡萄牙语是国语，在南美其他国家，西班牙语是国语的话，那末谁也不会把这些国家与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的分离看成是违反民族性原则或违反民主。

诚然，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往往与那种把所有讲同一语言的人结合在一个特殊的国家机体中的努力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只有对这样的地区才是可能的：在这些地区里住着聚集在一起的同一民族的群众，而且彼此互相接壤。

在这种条件下，民族统一要求的产生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即首要的因素，是使民族国家尽量庞大和强盛的愿望，这种愿望大致上和民主相符，除非这种强盛用于对别国施加暴力，而不是用于保卫自身以防止外国施加暴力。其次是一种由于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流而产生的要取消任何小国林立状态、取消国内关卡和争取统一的商业条件——货币和法典——的愿望。这些因素中的第三个因

素是一种在下层群众中間尤其活跃的动力：即如果在民族的邻近地区內他們同一民族的人受到很不平等的对待，或者甚至遭受虐待的話。民主的感受和民主的团結心愈强烈，那末要使同民族的人获得解放的要求也就愈加强烈。

似乎如果由馬札尔人完全統治奧地利，在維也納国会里只許讲匈牙利語，在学校和大学里只用匈牙利語讲课，国家官吏都必須人人精通匈牙利語，那末我們这位哈勒的同志也許才会不那么强烈地駁斥“瓦解奧地利，以便使那里的一千二百万德意志人归屬德国”。那时，他也許才会懂得，民主与民族独立之間有多大的关系。

針对着溫尼希想要借此嘲笑爭取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的那种企图，还必須提到另外一点：即他把这种努力看成是單純的死公式，看成“絕对的权利”。語言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和联系的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讲不同語言的人也能互相交往，只要通过譯員就行了。每个国家之內都形成經濟的、亲屬的、政治的关系，这些关系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比語言共同体的联結更加紧密。現代大国中沒有一个是一举而建成民族国家的，其中每一个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大多数至少还帶有从不同的民族建立起来的痕迹。在历史上的国家里的不同民族集团之間因而在这方面和那方面形成了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解除可能是令人痛苦的，甚至簡直可能引起經濟和政治的退化，如果这种关系的解除是采取征服的方式强行实现的話。如果有誰想簡單地把欧洲語言分布图拿来并且按照这个分布图来实现我們这个大洲的重建，那末他在有些地区将遭到强有力的反抗。我們不妨回忆一下亚尔薩斯人在 1871 年何等强烈地对于归屬德国表示抗議，而亚尔薩斯人对德語的熟悉程度是超过法語的。讲法語的瑞士人不願意成为法国人，而願意同讲德語的瑞士人繼續結合在一起。此外，还有些意大利人害怕，的里雅斯特在摆脱奧地利統治之后会陷入經濟衰落等等。

如果我們承认这些情况，那末民族性原則还有什么意义呢？溫尼希认为，于是我們只能維持現狀，而現狀却又同民族性原則一样地无法持久。

“人們也許會反對說，民族權利原則應該這樣地去理解：即不使今天的國家劃分有任何改變，首先德國和奧地利不應把任何異族居民和外語居民吸收入它們的國家組合之中。但是這除了意味着把人所共知的現狀提高到社會主義世界政治體系之外，不能再意味着任何其他東西……並且除此之外還意味着拒絕一切將來的發展，使目前的疆界永久化”。

自然，現狀並不意味着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界政治體系。另一方面，我們並不要求無條件地一定要實行民族國家的主張，並且把不符合這個主張的一切現有疆界全部改變。單單這一點就可以使溫尼希和我們那位哈勒的同志對此放心：我們並不要求使大國瓦解為無數個小的民族國家。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會看到，有辦法使小的民族國家合併成較大的共同體。

我們根本不是對現狀感興趣，而恰恰是對於如何改變現狀的方式感興趣。

民主制度以及與它密切相關聯的民族國家觀念要求：非經有關居民的同意，不得改變現狀。它還要求：任何國家都不能單單根據征服權而把那些反對改變的居民兼併進來。沒有人能像社會民主黨那樣地堅決反對現狀。但是也沒有人會像社會民主黨那樣堅決地拒絕那種作為改變現狀方法的征服權。如果我們站在這樣的立場上，那末我們所同意的改變現狀只能顯得是進一步接近民族國家的觀念，而不是又去違反這個觀念。

如果這次戰爭把目前基本上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德國變成一個多民族國家，也就是如果德國的非德民族的成份更加擴大，那末德國人民的遭遇就再不幸也沒有了。那些希望有這種結局的人，還從來沒有在一個多民族國家里有過親身經歷，所以不知道多民族國家會如何歪曲和壓制民主。

但是我們豈不因而違抗了經濟必要性嗎？難道經濟必要性不是迫使現代國家“超越它們的疆界而向外擴張，因為否則的話生產力的進一步擴大就不再可能了”嗎？

二 帝国主义国家的必然性

我們已經注意到，民族国家的观念，正如民主的观念那样，对资产阶级說来也已經失去了吸引力。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从一定的发展高度开始越过它的国界向外扩张，即使它从而会把異民族分子兼并进来。但是这并不是說，它显示出从一个民族国家变成多民族国家的趋势。

产生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扩张要求的新动力，就是帝国主义。我并不打算把已經讲过无数次的話在这里再重述一遍。关于帝国主义的原因和現象方面一般地应该讲的，已經充分阐述过了。除此之外我还需要补充說明的，我已經在我所写的关于帝国主义的一篇文章（《新时代》第32卷第2期第908頁起）中论述过了，請讀者查閱。在那篇文章里，我是这样說明这个命题的理由的：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体现在每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要求中：即征服和兼并越来越大的农业地区，不管其中居住着哪些民族。”（第909頁）

对帝国主义說来，有决定意义的是工业地区与农业地区之間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想要并吞的那些农业国家，在經濟上是落后的。它們因而在政治上也是落后的。它們还都处在原始公社或村社民主阶段，还没有能力建立現代的、民族的、大国的民主制度，这不是由于任何种族特性的緣故，而是因为它們还没有形成这种民主的物质前提条件。它們倒不是那种需要监护的、不能维护自己利益和不能管理自己的小孩，而主要是还没有能力在大国范围内做到这一点。

征服和奴役这种公社，对于中央集权的欧洲国家來說是很容易的事：不仅在民主公社和村社仍然完全独立的地方，而且在这些公社已經統一成原始国家的地方，情形都是如此。在这些地方，欧洲的专

制統治取代了本地的专制統治。

用这种扩展国家的方式，不会建立任何多民族国家，只会建立殖民国家。那些被兼并的新的分子，既沒有力量也沒有意志来参加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来用民主方式对其政治生活发生影响。他們只希望它能讓他們安靜生活。对于宗主国來說，这种扩大国家地域的方式不会引起国内政治上的困难。

虽然如此，但是这种方式却是与无产阶级的民主感情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背道而驰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与任何剥削和压迫都不相容的。即使在它們与无产阶级沒有直接关系的地方，它們也会間接地使无产阶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获得加强。而且无产阶级是不能靠这种方式来求得解放的：即让某些行业或某些地区的无产阶级个别成员成为剥削和压迫的受益者。这往往意味着无产阶级地位的削弱。

对于资产阶级來說，当然不存在这种考虑。如果资产阶级一旦下决心要把民族国家扩展为殖民国家，那末这种努力除了遇到其他殖民国家的对抗之外不会遇到任何其他限制。

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有其一定的限度。任何想要把已經达到民族国家阶段的国家扩大到超越这种限度的征服企图，都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即使它們在軍事上是胜利的。

兼并那些享有或者至少正在争取发达的现代民主的并且富于生动活泼的民族生活的、說別种語言而又不甘心被兼并的民族、借此来扩大民族国家的那种努力，会遭遇被兼并者的反抗；而且这些民族的地域愈广泛，其經濟和政治愈高度发展，他們的反抗也就愈强烈和愈无法战胜。甚至在俄国，对那些說別种語言的西方分子实行俄罗斯化，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在发达的现代国家里，甚至非常小的少数民族都知道去維持他們的特点和坚持他們的反对。即使是軍事上最大的成就，也不再能使这种情况有什么改变。

至于要取得或扩大殖民地的那种要求，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殖民地并不引起多民族国家的那种困难。但是殖民国家当然也不会显

出民族国家的那种巩固和团结。殖民地能够很容易地丧失给别的殖民国家，正如很容易从别的殖民国家那里取得那样；殖民地可以出卖和交换。估计土著居民大概不会对这种改变进行顽强的反抗。在这里，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各殖民地占有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另一方面，一个殖民国家进行扩张的限度也只是在于这个国家同其他殖民国家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方面。

反之，民族国家则在其居民的高度民主生活的条件下，对于异族征服国对其疆域所作的任何侵占和变更，会给予强有力的、持久的、几乎无法制服的抵抗；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连成一片的民族地域范围方面也有限度，这个限度是不能逾越的，除非使它自己的疆界也受到损害。这一切就使民族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力量，对于它的生存来说，比它的军队的力量更为重要；它的军队对于一个连成整体的民族国家来说具有纯粹防御的性质，如果它要继续保持是这种完整的民族国家的话。随着现代民主观念和多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民兵军队的观念也产生了。这三种观念都是由同样的政党和人民阶级所主张的。

相反地，大约在一个世代以前开始的帝国主义时期，则是以所有资产阶级完全抛弃民兵观念开始的；这个时期变成了一个不仅在陆上、而且特别在海上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时期。

温尼希和那位哈勒人士对此却只字不提。他们只是宣称，国家超越现有疆界向外扩张具有无法避免和必不可缺的必然性，因为否则的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大就不再可能了”。他们不仅认为帝国主义的扩张努力有其经济上的理由——这是无可置疑的——而且还因而认为它们同时也是必不可缺的。

值得注意的是，极端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地不谋而合。我们党的极右派和极左派都宣称，对于现存的生产方式来说，帝国主义是一种必然性。有些人当然就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支持帝国主义。另外一些人则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帝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我们要不要帝国主义，所以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同它对立起来，这就是说，不仅要宣传社会主义（我们半世纪来就是把这种宣传同

一切形式的資本主义統治对立起来的),而且要立即实现社会主义。

这看来似乎很激进,但其結果只能把那些不相信立刻实际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推到帝国主义陣营里去。这对于这种社会主义者来说是火上加油:他們說,我們是要社会主义的,但只要我們还没有得到社会主义,我們就必須是帝国主义者,因为一个好的馬克思主义者不能違抗“总的发展趋势”。在一定情况下,帝国主义对于資本来说是一种經濟上的必然性,因而对无产階級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資本主义发展愈迅速,无产階級的景况就愈好;无产階級是在資本主义生产过程停頓时期受害最重的。

如果有人要用經濟必然性的概念来进行論爭,那末他必須首先防止把經濟过程理解成僵硬的机械体。社会不是一个机械体,而是一个有机体。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伸縮性的概念和适应能力的概念。比起动物有机体来,社会有机体在还要高得多的程度上具有上述特性,因为它的成分不是无意識地对刺激发生反应的細胞,而是思維着的人,人在刺激与刺激所引起的行动之間往往有考虑,在这种考虑中,有时有意識地,有时无意識地不仅运用个人的經驗,而且还运用整个社会成千上万年的經驗,这种經驗在我們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以或多或少的不完整的方式积累下来。这种經驗的积累在个人的脑海里是十分复杂和多样的,以致于这种积累及其效果不是随时都能用我們的方法来加以估計的。只要它是无法估計的,那末意志就显得是自由的,虽然它实际上同任何自然現象一样都是有条件的。社会的整个过程,是无数个人意志活动的結果,这种意志有时在朝同样方向起作用时是互相加强的,而在朝相反方向起作用时是互相阻碍和抵消的。

虽然在天資和經驗方面个人与个人之間有种种差別,但是所有的人的机体当然基本上是一样的,因而只要在同样条件下,对同样的刺激,也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反应。只要我們在經常重复出現的过程中去观察广大群众,这种現象就到处可以看出来。从这种观察中就产生了对于包含着自然必要性的人类社会內部規律性的認識。根据这种

認識，我們就可以預見到，廣大群眾在一定情況下將會發揮什麼作用。然而這種預見的前提條件是：我們能確切地認識到在那種情況下發揮作用的一切因素。如果其中某些因素發生變化而我們不知道或者對這種變化估計錯誤，那末群眾的行動就會不像我們所預見的那樣。

各個階級的力量對比關係是最難被估計到的因素之一。每個階級的利害關係可以用理論分析來確切地弄清楚，但是它們的力量却不是隨時都能弄清楚的。這方面要考察到許多所謂無形因素，也即精神影響，這種影響是不能靜止地加以斷定的，它很容易隨着千變萬化的形勢而發生變化。譬如說，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階級矛盾是可以在純粹經濟的基礎上來加以明確認識的，還比較容易地能使工人們意識到這種矛盾，而且在做到這一點之後再把工人組織在一個以反資本主義為宗旨的特殊的工人政黨里，這也是可能的。

然而，這還沒有破除統治階級在那些不直接涉及到切身經濟利益的問題上通過宗教組織和習慣或者通過傳統的民族感情而對工人階級所施加的影響。決不應這樣設想，投票支持社會民主黨的任何人都會在同樣的程度上毫不猶豫地擁護社會民主黨整個綱領中的每一項。他會比較關心綱領中的某些項目，比較不關心另外一些項目，有些項目甚至不合他的心意。因此，社會民主黨可以隨時根據形勢的改變，把綱領中的不同項目提到首要地位，因而就能形成很不同的力量。譬如在國會選舉時爭論涉及到新稅收問題，那末擁護我們的群眾的人數一向比在反軍國主義和反殖民政策時多得多。也許可以把1907年的霍屯督選舉與1912年財政改革以後的選舉比較一下。

一個階級的思想獨立性，也即不受人們的情緒和暫時利益所左右的有充分根據的堅定信念，這就是首要的力量因素。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只根據錢包來解釋一切政治力量，這種看法是再荒謬也沒有了。歷史唯物主義解釋一切政治和社會現象，首先是根據物質條件，然而不是在一切情況下都根據物質利益。使城市無產階級顯得與小農有所不同的那種學習要求，應該歸因於城市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的特點，而不應該歸因於它的經濟利益，而且這一點也適用於滿足這種

要求的可能性問題上。如果我們指望現代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所取得的成就勝過從前的勞動階級的階級鬥爭所取得的，那末就必須同時把今天工人階級的較高的教育要求和較高的教育可能性看成是主要因素。

歷史唯物主義與這種認識決不是不相協調的：即階級鬥爭取得勝利的第一個條件是使鬥爭階級的頭腦從敵對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是恰恰這個因素是很難確切地看清楚的，這裡很容易會產生幻想。雖然經濟理論和統計方面有種種進展，但是階級之間和政黨之間的力量對比關係仍然是難於估計的，尤其在反常的形勢之下。

力量對比關係的轉變，最終可以歸因於經濟關係的改變。另一方面，力量對比關係則又能夠引起經濟變化，這種變化在一定情況下會徹底改變整個生產方式，在有些情況下會迫使生產方式很容易地適應新的條件。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經濟和技術混淆起來，他們把經濟關係看成是人与人之间所創造的物之間的關係，並且把資本與工資基金看成是物的堆積，從而就知道一定條件下的資本和勞動基金的數額。馬克思則指出，經濟關係是人与人之间之間的關係，它只不過通過物來做媒介而已，他還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各個形式的伸縮性和適應能力，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則把對生產過程的任何干預都說成是對社會的最嚴重的危害。馬克思指出，調節機構的干預，譬如說國家政權的或工會的干預，往往不但不損害生產過程，而且往往把生產過程提到一個更高的階段。譬如強制縮短勞動時間問題的情況當時就是這樣的，企業主曾為此預言道，勞動時間的縮短將引起工業的衰落。

從那以後，生產的伸縮性和適應能力並沒有減小，而是大大提高了，正如目前的世界大戰所明白顯示的那樣。這誠然部分地應該歸功於這一情況：即在工業中，科學日益替代了傳統和習慣，科學使工業處在一種永恆革命的狀態之中。另一方面應該歸因於企業的集中、企業在卡特爾和托辣斯里的組合、少數幾家大銀行對企業操縱程度的增長以及國家政權所具有的日益增長的經濟意義。無數的個人

意志在聞所未聞的新形势下很难迅速融合成一个統一的整体意志，現在少数几位掌握权力的人物已經替代了这种无数的个人意志，这些人物都是同样地关心和习惯于彼此間的协调。他們很容易就能够把整个过程导向一个新的方向。

生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伸縮性和适应能力，决不意味着資本主义的生存能力日益增强。資本主义的生存能力應該归功于这一情况：即資本主义越来越接近于那种具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特色的生产形式。然而它同时又仍然保持其資本主义实质不变，利潤仍然是它的动力。利潤的利益还照旧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互矛盾，生产方式不得不使产品数量的增长快于劳动力人数的增长。这些特征是与資本主义形影不离地結合着的；正是这些特征，它們在社会上一切沒有财产的阶级中唤醒越来越多的人起来反对資本主义，并且給資本主义的繼續存在規定了限度。資本主义的伸縮性和适应能力并不能使資本主义无限地发展和存在下去，而只能使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即使在不一定引起經濟灾难的情况下也会严重得足以引起政治和社会灾难，只能使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在沒有經濟崩潰的情况下实现。

如果人們注意到今日已經发展到相当程度的資本主义伸縮性和适应能力，那末他就不再会直截了当地根据帝国主义在資本主义中获得强大經濟动力这一事实简单地得出結論說：只要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帝国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想要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下抵擋帝国主义就是荒唐之至。

問題在于現在是否存在这样的社会阶层和阶级：它們所关心的是迫使資本的不可避免的扩展现在就选择除了扩展殖民国家的途徑以外的其他途徑；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來說，从現在起，殖民国家的扩展只能通过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来实现。此外，問題还在于这些阶层和阶级是否强大得足以抵擋帝国主义的趋势。

极迫切地关心世界和平和裁軍的这些阶层是存在着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和毋須证明的。小資产者和小农，甚至还有許多資本家

和知識分子，他們對帝國主義的關心不及戰爭和軍備競賽帶給他們的損害那麼強烈。至於無產階級，他們所以從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除了上述的動機之外還有民主和國際主義方面的原因。

支持着這種關心的力量，當然是無法估計的。對帝國主義感興趣的階層，不僅擁有極強大的物質實力手段，他們還對廣大的居民階層，同時也對工人階級發揮着強大的經濟和精神影響。

帝國主義的反對者是否有力量來抵消這種影響，這決不是有把握的事。但是也不能斷定就絲毫無能為力。我們已經看到，恰恰力量對比關係是有点無法估計的。這一點尤其適用於像現在這樣的正在出現着完全新的形勢的時期。

的確，代表國際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沒有足夠強烈地表明，要在戰爭爆發的情況下來制止戰爭。但是也許可以說，如果戰爭更明顯地帶有帝國主義色彩，如果戰爭不是處處被感覺到是一種維護民族獨立和完整的鬥爭，那末對戰爭的反對本來會更強烈些。

戰爭的進程將對帝國主義情緒和趨勢產生什麼影響，我們不得而知。無論如何，要阻擋這種影響，不是合適的辦法，如果有人硬說，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現階段中，帝國主義對資本主義生產說來是必不可缺的，只要還存在着這種生產的話。不管他在發表這種論調時抱有什麼企圖，他這樣做是有利於帝國主義的活動的，他在人民群眾中提高了帝國主義的精神影響，從而增強了它的力量。

同時，帝國主義只是一個力量問題，而不是經濟必然性問題。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來說，帝國主義不僅不是必要的，它對這種經濟生活的意義還被漫無邊際地大事誇張了。

可以指出，首先，帝國主義並不構成國家擴張運動的唯一動力。第二，殖民政策本身，恰恰從其最重要的現象來看，不是以帝國主義為根源的。最後，第三，帝國主義的武力政策，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來說遠遠不是必不可缺的，甚至今天在資本主義的各種擴張方法當中，也是最費錢和最危險的，但決不是最有效的一種；除了它之外，可以採取經濟意義大得多的其他方法。

三 国家扩张要求的原因

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是财政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結合。

誰想要了解資本的历史作用,就必須明确区别資本的各种类别。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第三卷中首次作了这种区别,他在这本书里区分了工业資本、商业資本和貨幣資本。

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下去,我后来在 1898 年考察了各种資本对殖民政策采取什么态度,并且还在关于《旧的和新的殖民政策》和后来关于《胶州問題》等一連串文章中說明了新的帝国主义政策与以前的殖民政策区别何在。(《新时代》,1897—1898)我在 1900 年为反对席培尔而进行的詳細論辯中曾对上述論述进行过补充,席培尔为当时的軍舰問題提案进行鼓吹,其一部分理由是因为“目前每个英国人都在灵魂深处頗有海盜思想,正如每个普魯士人都有宪兵思想那样。”(《席培尔、勃倫塔諾和軍舰問題提案》,《新时代》,1899—1900)最初在 1901 年出版的我所写的《貿易政策和社会民主党》一文以及最后在《社会主义和殖民政策》的小册子(1907年)里都是根据同样的思路进行論述的。在上述著作里,我对有些方面曾詳細闡明理由,我在下面只能簡要地提一提这些方面。

希法亭的《财政資本》(1910年)在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财政資本及其經濟根源、条件和趋向加以首次詳尽的从而也是彻底的論述,这一点在今天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了。

工业資本,工业企业主阶级,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商业資本和财政資本完全不同的趋向。它倾向于国际和平,倾向于用議會和民主制度来限制絕對的国家权力,倾向于国家預算方面的节约;它一直是反对食品和原料关税的。它往往甚至把工业税看成是一种教育性质

的稅收，看成是工业落后的結果，这种落后應該随着經濟的发展而消失。

相反地，財政資本，大債主和大銀行家的階級，則傾向于促进絕對的国家权力，傾向于用暴力来实现其对內和对外的要求。它在大宗的国家开支和国家債務上是有利可图的，只要这种开支和債務还不至于达到使国家陷于破产的程度。它与大庄园之間的关系很好，而且絲毫不反对用农产品關稅来使它們得到好处。

經濟的发展，使貨幣資本以及同它相适应的政策比工业資本早得多就掌握了政权。但是在上一个世紀里，工业資本掌握了政权，并且把貨幣資本家在国家中的影响显然排挤到次要的地位。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暫时的阶段。这个阶段終于被另一个阶段所取代，在后一阶段里，工业資本采取了股份公司的形式，以前这种形式对商业資本和貨幣資本來說早就具有巨大的意义。于是工业資本中最大和最强有力的部分就与財政資本相結合，同时还替財政資本同大地主庄园取得協調鋪平了道路。托辣斯和大銀行的集中，使这种发展达到了最高峰。

財政資本的国家化傾向，这时就变成了資本主义先进国家里經濟上居統治地位的整个階級的普遍傾向。

这就是人們称之为帝国主义时期的当前阶段的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商品出口获得了新的性质这一事实。資本主义生产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为了滿足国家的內部需要，而且还致力于出口。資本主义生产所提出的第一个理論原則就是：尽可能多地把本国产品銷往外国而尽可能少地从外国买进。然而这些輸出的产品只服务于外国的消費。在帝国主义时期，这种出口已經不再能使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利用。于是必須輸出那种将在外国充作資本的生产資料，譬如建造和經營那些用来打通农村地区的铁道所需的器材，营建矿山、种植园、最后还有工业等等所需的机器。

第二种特征的趋势也許是最难抵擋的。只要資本主义經濟还存在，这种趋势也就一直存在。只有对經濟发展加以限制或者阻撓，才

有可能遏止这种趋势。另一个问题是：是否第一种特征的趋势，也即财政资本所利用的国家方法，因而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只能用一种会引起经济萧条的办法来加以限制。

这些方法中最明显的一种就是殖民地扩张。受财政资本操纵的国家政策的整个方针就因此而获得了它的称号。那种为建立一个大帝，一个世界帝国而作的努力也由此而取得了帝国主义的称号；这种帝国的农业地区将广泛得足以吸收宗主国的剩余资本并且为宗主国的利益而利用这些资本。人们在谈到今天国家的扩张需要时，随时随地都很容易地会想到帝国主义。在一方面，帝国主义被看成是一切扩张努力的根源。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扩张被看成是目前还有可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唯一方法。

我们先来考察前一个假定。如果我们具体地密切注意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努力，那末我们就发现，以工业资本和财政资本的互相结合以及资本输出的需要为标志的帝国主义倾向，决不是扩张努力的唯一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较原始的倾向在起着作用，帝国主义倾向仅仅是其中最新和最明显的，它们最令理论家感到兴趣。正如对任何其他现象那样，他可以只用以下这种方式来彻底认识上述的原因：即孤零零地观察这种倾向，而不去考虑一切扰乱思路的其他情况。这当然并不证明这些情况不存在。理论家必须考虑到这些情况，如果他要考察整个过程的话。

国家的扩张性的努力，不是每次都直接出于经济上的动机，即使它永远是以经济条件为依据的。争夺权力或争取安全的努力也可以影响它。

一切扩张倾向中最原始的倾向，正是这种不仅用掠夺方式暂时地、一次地强行占有别人劳动的成果，而且用经常的纳贡方式不断占有这些成果的倾向。这种倾向一直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那样久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倾向是与原始村社或公社民主密切相联系的。在现代官僚制度的方法和手段还没有发展出来之前，异族统治者就只能从公社或合作体，而不能从个人那里征收贡品

和賦稅。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關係常常成爲一種保持、鞏固或重新形成原始共產主義的手段。

俄羅斯專制主義就是這樣直到不久以前還一直以村社共產主義爲基礎。十七和十八世紀在巴拉圭的耶穌教團的“親善的、開明的”專制主義也是如此。在英屬印度的一種廣泛推行的稅收制度以及在荷屬印度替外國剝削者干活的整個農業徭役制，都是爲了國家的利益而建立在這種共產主義基礎之上的。

國家從事這種擴張的前提條件，只是本國在權力手段方面的優勢。任何要促進本國工業之類的經濟需要，在這方面並沒有起作用，而只有那種要掌握更多奢侈品和權力手段的需要起作用。它無非是一種變成永久制度的原始掠奪而已。

反之，凡是在由於宗主國人口過剩而產生真正的經濟需要的地方，經濟需要才成爲擴張政策的原因。這種擴張要求，在人類歷史上曾發生過巨大的作用。但這不是在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時期。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在實行這種政策的同時，歐洲國家一直在抱怨人口缺乏，並且一直在力圖增加人口。誠然，我們在有些地區看到了大量向國外移民，但是這不是由於人口增加過多而引起的，而是由於日益抬頭的專制主義的政治壓力，由於那種使農村居民喪失財產和使無產者人數遽然增加的經濟壓力所引起的。

在十九和二十世紀，情況並沒有好轉。目前的移民幾乎完全出自某些地區，而這些地區在輸出人口的同时還輸出食物。因此，向外移民決不能歸咎於糧食給養範圍的縮小。

現代殖民政治家硬說，爲了容納工業國的過剩人口，殖民地是必要的，這種論調是再富於欺騙性也沒有了。今天，像俄國、巴爾干國家、愛爾蘭和印度等農業國都是對外移民國家。人口稠密的工業國家却是容納移民的國家。

在农村階級中，推動擴張政策的，遠非農民，而正是大地主。農民不要求得到比他和他的家庭所能耕種的數量更多的土地。不用自己的勞動而用工資勞動者和強迫勞動者來耕種土地的大地主，他們

所需要的土地的数量是怎么也不会够的。凡是封建貴族掌握着必要的軍事力量的地方，他就力图扩大国家的領域，国家的領域当然就会变成他的領域。所以，在中世紀，貴族就是德国对斯拉夫人所实行的擴張政策的灵魂；在西班牙和法国，除了专制主义之外，貴族是十六和十七世紀的殖民政策的最强大的动力。在美洲，西班牙和法国征服者建立了新的封建統治。西屬美洲正如欧洲的西班牙一样，今天还受到这种擴張政策后果之害，这种政策与促进經濟进步簡直是毫不相干。这种政策加强了西班牙的专制政治和封建統治，同时还使这个国家卷入无穷无尽的战争之中，战争終于摧毁了西班牙，虽然很久以来西班牙軍隊在戰場上立下值得驕傲的战功。

西班牙人帶到他們在美洲的屬地去的大庄园制度，还妨碍了这些地区的經濟发展和政治巩固。墨西哥的情况就是大庄园肆无忌惮的統治的結果，这种統治并不因为大庄园如今向美洲和欧洲的投机商兜售国家的利益而有任何改进。

法国在十八世紀并未因它在美洲的殖民政策而蒙受多大的損害，因为法国把它的殖民地丧失給英国人了。这种政策并没有像在西班牙那样加强了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它的失敗倒很有助于削弱和推翻法国的这些势力，有助于法国革命，从而使这个从殖民負担之下解脫出来的国家获得新的巨大的发展。

在美国，推动擴張政策的主要也是南方諸州的奴隶主。奴隶主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如此肆无忌惮的掠夺性的种植，以致于他們很快就地力耗尽，并且产生要不断占領宜于种植烟叶和棉花的新地区的要求。在他們的推动之下，美国对墨西哥进行了几次大規模的征服性的远征，这些远征使美国在 1844 到 1848 年之間兼并了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諸州，这片地区几乎等于德意志帝国三倍那样大。

在 1861 年开始的南北战争中，奴隶主的权力被北方产业資本家、无产者和农民粉碎的时候，美国的擴張要求在一个长时期內归于結束，这对它的經濟发展頗为有利。

商品生产还发展了一些新因素，这些因素不时地引起国家性的扩张要求。其中最原始的因素是在一个地区里找出一种很有销路的商品。于是立即就产生了占领这个地区的要求。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权力和财富的商品，当然引起最强烈的扩张要求，因为人人都可以用得着它，人人都能取得它，谁也不会嫌它太多，这种货物就是钱币、黄金和白银。

它们是吸引西班牙人到美洲去的最初的引诱物，后来大庄园才接着在那里建立。在加利福尼亚则情形相反，黄金使那里的大庄园身价十倍，并且吸引了无数的移民迁入。澳大利亚也由于黄金而对英国产生了重要意义。

直到今天，黄金财富仍然是殖民政策和扩张政策的推动力之一，正如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布尔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正是在黄金财富上面，人们特别明显地发现了新帝国主义的特征。它使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第一次在英国人民群众中间尖锐地显示出来。然而从黄金财富这四个字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它还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

我们不要忘记，帝国主义被我们个别同志理解为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一种必要性。帝国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意义据说就在于此。他们在这里只能看到帝国主义的工业方面，也即一方面是财政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結合，另一方面是日益增多的资本输出的必要性。这两方面在布尔战争中只起了微小的作用。力图要占有金矿（还有金刚石矿）的，与其说是已经变成财政资本的工业资本，还不如说是纯粹的财政资本。力图要开拓那个国家的，与其说是出于一种用日益增长的出口来取得黄金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不通过商品交换而取得黄金的需要。这也就是当年在十六世纪曾经鼓舞过西班牙人的同样推动力；区别只在于：它并没有给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只给某些金融巨头带来了好处。

新的金银财富当然可以大大促进资本主义工业，但是它无论如何决不单单就在占有金银出产地的国家里发挥这种作用。西属美洲

在貴金屬方面的丰富出产,比起大庄园来,更有助于加强宗主国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教会在与資產階級对抗时的权力。这种丰硕的財富被消耗在輸入奢侈品,尤其在无穷无尽的战争上面,战争使西班牙人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蕪;尽管如此,西班牙还能在长时期內幸免于外國的入侵。

个别地区所特有的一些其他产品,比起金銀来,对于擴張要求的意义虽然小些,但还是重要的。尤其是貴重的皮貨在这方面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它促使英国人和法国人去占領北美洲,促使俄国人去占領西伯利亚。

在十六世紀銷路极好的香料,也屬於最貴重的貨物之列,它起先把葡萄牙人,后来又把荷兰人吸引到印度去。現代医学和化学已經使个别的、有限的地区丧失了这种吸引力。

另外一种非洲产得特別出色的貨物——可运送和可出售的劳动力,对于非洲的所謂“殖民地化”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利可图的奴隶交易使各国,包括德国人在內,在十六和十七世紀为了猎取人口和販賣人口而占領非洲地方。今天,特別是象牙和橡胶,正在使非洲中部淪为殖民地。

擴張政策的这种动力,照例是很短促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要极迅速地取得,从而也取尽那些自然界所提供的产品,而不是要有計劃地用人工来生产它們。然而正因为如此,他們就力图迅速采取行动,力图不断地开拓新的地区,正如美国南方諸州的种植园的掠夺性耕种那样。产皮动物的不断絕迹,使俄国人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橫貫和并吞了整个西伯利亚。大象和橡胶树的同样迅速的絕灭,就构成了如此迅速从事的开拓赤道非洲尤其是并吞赤道非洲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縮小而不是促进这种掠夺性的耕种的发展,才是有利于經常保持那些銷路良好的产品的供应。用狩猎和砍伐方式不断在新的地区內連續取得这种产品直到它們絕灭的这种危險愈大,就愈有必要使人們用有計劃的生产的方法在特定的有限的地区內不断重新生产它們。

夺取貴重产品以及占领那些藏有貴重产品的地区的要求，当然是以商品交易为其前提条件的。猎人之猎取产毛动物，不是因为他自己需要皮货，——他自己的需要很快就满足了，——而是因为商人能把他所猎得的皮货悉数收买。

扩张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是商品交易所固有的。商品交易在以前既是对外贸易，又是对内贸易。交易的最初形式是公社与公社之间的交易。这种形式比同一个公社内部的贸易产生得还早。伴随着扩张的需要，同时也出现了垄断和竞争的需要。对自己来说是垄断，对别人来说就是竞争。他的动力是利润，利润是他在廉价购进而高价售出之中取得的。当他独自一个在市场上作为购买者而出现而且愿意出售的人非常多的时候，他就能以最低廉的价格买进。同样，当他作为独一无二的出售者出现在市场上而需要这种货物的人却非常多的时候，他就能以最昂贵的价格售出。因此，商人预先就设法使竞争者不进入市场，但是这照例只有用暴力才是可能的。他决不可能独自就有这种力量。必须由国家来向他提供这种权力。因此，商人力求建立一个强大的但当然是效忠于他的国家政权，同时力求扩展那些被国家政权所征服的地区并且在这个地区内尽可能取得特殊的特权。他最好是采取一种与十分强大的财政资本相结合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点，这种结合比工业资本与财政资本之间的结合的出现要早得多。

自从十六世纪以来欧洲的整个殖民政策中，商业公司，也即由国家给以商业垄断权的股份公司，起着不断增长的巨大作用。它们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它们也已成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有在建立了强大得足以打破这种公司的垄断并且制止它们的扩张政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之后，资本主义才能进一步朝前发展。

工业资本家从根本上说来也不过是一个商人。工业资本家的动力也是利润，他也是从廉价购进而高价售出之中得利的。但是他的利润的最重要来源是能够生产出比劳动力成本还高的价值的劳动力。当然他的利润不单纯取决于此。如果他在购买原料时出了错，

原料买得太貴，或者购置了坏机器，那末他的利潤就可能减少。同样，如果他对需求估計錯誤，他所生产的貨物长期未能售出或者根本没有銷路，那末他的利潤也会减少。在这一点上，他同商人沒有区别。然而对商人來說是其整个利潤追求活动内容的东西，对工业資本家來說只是一种附带現象。对工业資本家來說，主要的問題仍然是廉价购买劳动力和尽可能地利用这些劳动力。

他希望自己保持壟断，正如同他希望別人，也即希望工人互相竞争。对他來說，企业家协会从来就是天經地义的东西，而工人团体則很久以来就是凶恶的挑撥者的組織。

同时他不仅希望工人互相竞争，并且希望那些卖給他原料和卖給他的工人食品的商人互相竞争；而且还希望那些想要购买他的貨物的商人互相竞争。

这些人在市場上竞争得愈厉害，对他就愈是有利。因此，他希望取消一切商业壟断，取消在市場上对外国商人的排挤。他希望一切国家的一切商人享有充分的自由。

这种見解由于工业資本而取得了胜利，从而才得以促进工业資本的迅速发展，并从而完全改变了国际关系。

商人或商业公司力图获得的壟断，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也即通过自己的暴力或国家的暴力。只要这种壟断經濟还存在着，每艘商船就都是一艘軍舰，虽非每个英国人都有，但每个商人，不論他是哪个国家的，却都有“灵魂深处的海盜”思想，而且在海战中失敗的国家的貿易也就不仅是暂时地，而是长期地从海洋上被排挤出去。当时这句话是一針見血的：国旗到哪里，貿易就跟着到哪里。这里的国旗就是战争中的軍旗。当时英国的海外貿易由于它的舰队的威力而达到控制世界的規模，或者还不如說，它的海外貿易和軍舰威力二者之間存在着极密切的互为因果的关系。因为如果没有一大批促使海上貿易和海洋漁业发达的无数大胆而老练的水手，英国的海軍就不能获得它的优势。軍舰的建造，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自从十九世紀以来，自从商业壟断的时代完結以来，軍舰到

哪里貿易就跟着到哪里这句话就成为不合时宜了。现在，和平是貿易的正常状态，貿易的动力不是那种保护着壟断地位的大炮，也不是魚雷，而是利潤。人們从那些售价最低廉的商人那里买东西，而不是从拥有軍舰最多的商人那里买东西。

航运业取决于海軍舰队的水平，这一点也不再适用于航运业了。挪威这个小国拥有在欧洲仅次于英国和德国的最大的商船队，它在1911年拥有1,646,000登記吨位。它比仅次于英德两国的欧洲最大海上强国的商船队还大，也即比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商船队还大，法国只有1,462,240吨，意大利有1,107,190吨(1910年)，俄国在1913年只有756,600吨。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的商船队合計几乎有德国商船队那么强大，德国商船队在1913年的总吨位是3,153,724登記吨位，而斯堪的那维亚三国的商船队則合計有2,990,290吨。

同时，海外貿易也完全不取决于航运业，不取决于商船队的大小。貿易可以用外国船只来运送貨物。这个国家于是就損失了运输收益，但是这未必就会妨碍工业的发展。美国的商船队是极小的，而它的海外貿易則是在世界上除了英国以外最大的。在1912—13年度，有总吨位达五千另六十万吨的船只到达美国港口，而到达英国和爱尔兰港口的船只是七千六百二十万吨，到达德国港口的船只只有二千五百五十万吨。

比利时是一个最明显的实例，足以說明海外貿易的发展如何不取决于商船队。比利时的軍舰等于零，它的商船队在1912年有船只105艘，共181,600登記吨位。但是在1912年有总吨位达一千六百四十万吨的船只到达比利时港口，其中一千四百五十万吨是外国船，一百九十万吨是本国船。

即使英国人有摧毁德国商船队的打算和力量——这种打算和力量大概都不会有，这也并不就意味着对德国商业和德国工业的摧毁。这当然会是对德国財富的一种严重損害，就正如陆上战争在东普魯士所造成的任何其他同等价值的破坏那样，或者就像支付一笔战争損害賠償那样。

摧毁如此大量的交通工具将严重损害贸易和交通事业，但是受到损害的是整个国际贸易，不单是德国一国的贸易而已。另一方面，如果反过来，如果由于摧毁了英国的商船队而使国际商船队目前的运载能力削减一半，那末德国的贸易也会受到损害。

在 1912 年，除了沿海航运之外，有一千三百万登记吨位（精确数字是 12,960,273 吨）的德国船只到达德国港口，同时也有几乎同样多的外国船只（一千二百五十万登记吨位，精确数字是 12,529,776 吨）到达德国港口，其中有一半是英国船只（六百万登记吨位，精确数字是 5,957,123 吨）。

在 1651 年时，英国还能通过一项航海法案，其中规定，运往英国的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货物出产国的船只来运送。自从 1815 年以后，这个法案不得不一一条一条地被取消，其一部分原因是外国那一方面也采取措施来阻碍英国的贸易，其中包括那些没有大量军舰但是同英国有频繁贸易往来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后来是普鲁士），另一部分原因是英国贸易本身受到这个法案的损害。最后在 1849 年，这个法案完全被废除了。从此以后，国际贸易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以致于类似的法案完全无法实行，它势必会十分严重地扰乱国际贸易，因而再没有任何人想到要作出这种规定，即使他灵魂深处的海盗思想如此强烈。

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财政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的日益结合，的确产生了一种新的垄断精神。但是它们所争取的不再是本国的商业垄断，而且也不是为了保护这种垄断和摧毁外国商业而进行的战争。新的垄断努力的出发点是要在经济上控制大量交通工具和生产资料来源。既然这种努力涉及海外贸易，这种努力根据它目前的广泛规模和性质，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在已经成立的航运托辣斯或联营中，德国和英国船主都一致合力维持高昂的运费率。

但是，与航运完全分离的商业，则在实现这种垄断努力方面丝毫无利可图，这种垄断只会使商业同工业一样地受到限制。

除了要获得商业垄断并且要扩展其地盘的努力之外，还有另外

一种扩张性的努力，这种努力是由于日益兴起的商品交易而产生的，而且直到今天还发挥着历史作用，它现在往往被称为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虽然它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很早就出现了；这就是争取海港的努力。

水上运输从来就是最廉价的货物交流方法。对于像谷物或者木材、矿砂等大宗货物来说，水上运输很久以来就是可以运送这种货物的唯一运输方法。甚至在今天，在铁路已经能够在陆上进行大批运输而且其运费惊人低廉的时代，对于运送那些交货期限不必很短而且不必严格遵守交货期限的货物来说，水上运输仍然比铁路优越。

自由进入海洋对于参加世界贸易的好处在这里还没有全部说尽：海洋——至少在和平时期——是任何人都能自由进入而且能无条件地加以利用的唯一途径。与海洋隔绝的国家，总是要服从邻国的关税政策，仰赖邻国的道路、运河、铁路的状况，而这些并不是根据它的需要反而往往是违背它的需要而设置的。只有拥有海港的国家，才能与世界市场建立直接的联系。一旦海港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增加了，一旦出口和进口已成为这个国家的切身利益，于是立即就会产生一种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直推进到海岸的需要，只要有可能会用某种方式做到这一点。

塞尔维亚目前还处在这样的阶段里：即不仅它的民主阶层对于建立民族国家很表关心，而且它的统治阶级也有这种需要。但是要取得海港的愿望却使它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违背了民族原则，当时它要求取得阿尔巴尼亚领土上的都拉索港。如果今天有一个独立的波兰从战争中产生出来，那末它同时也会努力争取波罗的海的港口。但泽港等海港是属于旧波兰共和国的。

当彼得大帝想到要使俄国与世界贸易建立联系时，他也立即设法朝着海洋扩张出去。他终于能够使俄国一直推进到波罗的海沿岸，卡特林娜二世把帝国的领土一直推进到黑海沿岸。但是这两个海，波罗的海和黑海，都是内陆海，通过它们前往世界海洋的交通随时都可以被阻断。这就是俄国一心渴望取得君士坦丁堡的目的所

在；这个港口控制着黑海的出口并且使俄国最重要的出口貨——它南方各省的谷物出口取决于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統治者的心意。

如果仅仅考虑到俄国的貿易，那末俄国要取得君士坦丁堡的要求在那些同样关心对俄貿易繁荣的西方資本主义国家中間就不会遇到反对，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自由貿易者和工业家，而且恰恰它的激进派人士，总是亲俄派，这一点曾令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很不愉快。

但是俄国也是一个巨大的軍事强国。它是迄今以来有力量来危害英国在东印度的屬地的唯一国家。一旦它在君士坦丁堡取得基地，它就会威胁地中海国家，法国和意大利；君士坦丁堡将使俄国能够控制希腊、小亚細亚、叙利亚、埃及。

因此，許多国家总是反对俄国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俄国的軍事威力与其說是促进它自己向那里推进的手段，还毋宁說是由于这种威力所产生的猜疑而阻拦它不能接近那里的手段。这在世界历史上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一个国家的異常强大的軍事力量所得到的結果恰恰与它所要得到的相反，因为这种軍事力量在其他国家那方面引起了猜疑而且促使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反对那种被他們看成是共同威胁的行动。

与世界貿易有利害关系的各个阶级，都会感觉到与海洋发生直接联系的需要；世界貿易对整个經濟过程的支配程度愈大，这种需要就愈会变成民族的需要，包括农民和工业界在內。

在帝国主义以前的时期，工业資本就已經以其他方式对擴張政策感兴趣。在有些国家里，資本主义工业的条件是如此地不利，以致于它根本沒有能力在世界市場上进行竞争。在这些不利的生产条件当中，首先是工人阶级的落后。人是最主要的生产資料，人的素质决定着工业的繁荣。国家再沒有比不断关心工人阶级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发展更能促进工业的办法了；也再沒有比压迫劳动阶级更能損害工业的了。

工人阶级愈是受压迫，愈是落后，愈是沒有效率，工业就愈是要依靠愈来愈重的关税来保护，以便对付国际竞争，維持自己的地位。

同时，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都必须发展，都必须扩大它的销售地区。如果它没有能力进入世界市场，那末它就努力要用扩大那种保护工业的关税壁垒因而也就是扩展国家领土的方式来扩大销售地区。

目前，俄国也是说明这种情况的最明显的实例。受到农奴制度传统的束缚、被国家用暴力强迫保持在愚昧状态之下、被阻止参加任何组织、陷于劳动过度和酗酒习惯之中的俄国产业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去从事仅仅近乎可以与西欧工人相比拟的那种劳动。

而这种使工人们如此落后和如此降低工人生产率的情况，也使俄罗斯农民的消费能力下降，这不是指他们的需要，而是指他们因购买俄国工业所出产的质地低劣而价格高昂的产品而引起的购买力的下降。如果要扩展它的销售市场，那末最方便和最易实现的办法是扩展俄罗斯地域，即不是推向拥有巩固的民族国家、现代民主和发达的工业的西方，而是推向东方，推向只拥有原始民主以及在原始民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军事实力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地区。所以俄国越过高加索山，侵入中亚细亚，直到喜马拉雅山，在满洲建立了据点，目前还设法要夺取蒙古和波斯。

在这方面，决定性的当然还不单单是资本主义工业的需要。在这里更有力地发挥着作用的是整个原始扩张性的努力；这种努力我们从历史的上古时期起就一直看到，而且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标志，这就是要增加贡品和扩大纳贡地区的需要，它的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就是努力要增加纳税人的数目，增加赋税的数额，给财政资本提供新的物资供应和剥削对象，增多供军官和官僚占据的薪俸优厚的职位的数目，从而增多专制主义的权力手段。

对于俄国工业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缩小这些阶级的影响和收入。人们可以用这种扩张政策的代价以及这种政策在百年以来所引起的战争的代价来设立无数的学校，使俄国的交通条件变得十分出色，大大提高农民的农业经济的产量，从而一方面可以迅速提高农民阶级的消费能力以及产业无产阶级的生产率，同时对于俄国工业来说，可以把销售和竞争能力提高到高度的水平。

扩大国家地域的方法，当然是比较方便的方法，这不仅因为它不需要较多的考虑，而且首先因为这种方法在当权派方面不会遇到反对，而且受到支持。实行这种方法，是一种单纯的力量对比关系，不是经济必要性。如果破坏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经济本来会更良好得多地朝前发展。

如果说俄国工业在效率方面目前比较接近西欧的工业，那末这不应归功于俄国的扩张政策，而应归功于外国资本的流入，归功于工人运动不顾种种障碍而获得的发展。

我们迄今所考察过的一切扩张性的努力，严格地说，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帝国主义方针不渗透着这里所阐述的带有帝国主义以前时期的形式的扩张性的努力。

这种努力都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但是其中大多数在经济上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是那些不是要促进而是要限制工业发展的势力的产物。愈能遏制这种势力，就愈能使经济更好地朝前发展。

四 帝国主义的各种类型和目标

甲 不列颠国家联盟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殖民国家中，英国是由殖民政策促进它工业发展的唯一国家。诚然，追求着绝对权力的国王和追求着封建地产的贵族，曾经参与殖民政策的发端，但是英国的海上权力和它的殖民地直到这样的时期才具有巨大的意义：这时各资本主义的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经强大到足以求得它们在海上的权力和殖民地所产生的果实中应享的份额，并且从而进一步发展商业和工业。英国首先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和依靠资产阶级革命才获得海上霸权的。这次革命在十七世纪中叶取得胜利，然后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肯定地宣告结束，从此国家权力就移交给了忠实于甚至可以说是屈服于资本主义利益的国王和贵族，同时让那些较高级的资本主义阶层作为共同摄政者参加了议会。正如在十八世纪那样，十九世纪英国殖民政策的形成也是相当特别的。英国殖民政策所依靠的两根支柱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而且都不可能有的。如果有一天发生这两根支柱摇撼英国的最高权力的情况，那末再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使这两根支柱归顺于它们。而且从来没有产生过可以形成任何与此类似的支柱的条件。

构成不列颠殖民帝国的两根主要支柱之一的是欧洲作物的三大农业殖民地：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它们的居民当然是很少的，如果用总数约达四亿的全部英国属地的居民人数来衡量的话。但是它们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它们的居民不仅已经越过原始民主的阶段，而且还十分富于现代民主的要求，甚至胜过欧洲的居民，因为他们，正如美国那样，无论在国家制度上或者在他们的思想上，

都沒有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时代的遗迹的拖累。

在經濟上，这些殖民地無論作为购买者或作为銷售者，都对世界市場具有极大的意义，它們有能力經營强大的、不受任何重大負擔压迫的現代农业。

加拿大在 1911 年有七百万居民，南非联邦六百万，澳大利亚联邦与新西兰五百五十万。

在 1912 年，大不列顛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英国商品对殖民地的輸出总额达一亿七千七百万英镑。其中半数以上是輸往上述三个殖民地的。对加拿大和紐芬兰輸出二千四百四十万英镑，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輸出四千五百二十万英镑，对南非（好望角、納塔爾、德兰士瓦、橘河）輸出二千一百四十万英镑，合計九千一百万英镑。在英国对殖民地輸出中，其次要考虑的是英屬印度；它与錫兰在 1912 年从英国輸入六千另五十万英镑的貨物。不列顛殖民帝国的其他屬地只占二千五百五十万英镑，其中三百五十万英镑是輸往香港的，这應該算作对中国的輸出。对非洲殖民地（除了上述南非四个邦以外）的輸出只有八百一十万英镑。

其中当然沒有把埃及列入，埃及沒有被算作英国屬地。埃及在 1912 年輸入了九百五十万英镑的英国貨。

我們从进口中也可以看出类似的情况。联合王国从殖民地进口的总额在 1912 年达到总值一亿八千六百万英镑。其中最大的部分来自上述三个殖民地。加拿大二千七百七十万英镑，澳大利亚五千六百四十万英镑，南非一千一百二十万英镑，合計九千五百三十万英镑。其次要提到东印度，計五千九百七十万英镑，来自其他屬地的只有三千一百万英镑，其中除南非以外的非洲占六百四十万英镑。此外，当然还有埃及占二千五百八十万英镑。

这些数字就已經表明，这三个大的欧洲移民居住地在不列顛殖民帝国内部已經获得何种占压倒优势的經濟意义。

这个意义会显得更加巨大，如果人們考虑到英国对这些地区輸出多大数额的資本的話。在这一方面，我信賴阿斯凱夫在他关于英

国帝国主义的补充小册子中所列举的数字(第 38 頁)。

根据这个材料,在 1908 年到 1913 年期间,英国对它的殖民地投入了四亿三千九百五十万英镑的资本。其中三千五百四十万英镑在南非,六千四百三十万英镑在澳大利亚,对加拿大的投资则不下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万英镑。加拿大尤其是有前途的国家。对三个殖民地投资合计共达三亿二千三百五十万英镑,合六十五亿马克。其次还要提到印度,它获得五千九百万英镑的投资。对其他殖民地的投资数额不到五千七百万英镑。

下列表格足以表明加拿大是何等重要的前途无量之国,是英国殖民地中间经济扩张最迅速的国家。

每三年里输出资本的数额是:

	(单位: 百万英镑)增长(+)或下降(-)		
	1908—1910	1911—1913	
加拿大	91.5	132.3	+40.8
澳大利亚	28.9	35.4	+ 7.5
南非	20.9	14.5	- 6.4
印度	46.4	12.7	-33.7
其他殖民地	38.0	18.8	-19.2

由此可见,英国资本正在以越来越强烈的偏爱,对加拿大,其次对澳大利亚,进行投资。

这两个地区以及南非对英国工业和资本的重要性毫无问题是很巨大的,而且其意义还一直在增加。但是这种重要意义不是基于这三个地区作为殖民地的特性。严格说来,它们根本不是殖民地。它们是享有现代民主的独立国家,也即民族国家,它们享有比除了瑞士之外的任何欧洲国家还多的自由。它们实际上并不构成一种受支配的英国属地,而与英国处在一种联邦关系之中,与英国结成一种国家联盟,这个联盟的人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都在迅速增长,不仅由于自然的繁殖,而且还由于移民的迁入;尤其在加拿大,过去几年里移入的移民十分之多。其数字在 1909 年是 147,000 人,在 1912 年

是 354,000 人。这样，它不仅获得了一大部分从英国迁出的移民，而且还增添了一大部分从英国以外的国家迁出的移民。

这种国家联盟毫无问题是一种国家，它具有远大的前途。如果有人想要在这种联盟里面看出帝国主义的特征和目标，那末我们也不能提出什么理由来反对它。

但是，使那些构成不列颠殖民国家联盟的国家成立起来并且使它们结合起来的，并不是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很久，英国就占有了它们，但是却不了解它们未来的重要性。澳大利亚被估计得如此的低，以致于它长期被用作是一种单纯的流刑殖民地。自从 1851 年发现黄金之后，才有大量的移民自愿迁入，他们提供了加强澳大利亚农业和工业的基础。

加拿大在十七世纪首先由法国人占领，他们在加拿大建立封建地主统治和专制的官僚和僧侣统治，这种统治没有吸引许多移民。英国人在七年战争期间征服了加拿大，不是因为加拿大具有经济上的价值，而是因为加拿大使法国人处于这样的地位：可以从加拿大出发来威胁加拿大以南的重要得多的英国殖民地。但是英国人正是由于从加拿大赶走了法国人，却丧失了他们原先的殖民地。当这些殖民地还感受到法国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威胁的时候，曾一直保持忠于英国。当这种威胁消除时，它们中间立即滋长了完全独立的思想，并且不久就在它们以前所害怕的同一个法国的帮助之下获得了完全独立。1763 年，加拿大成了英国的，而在 1775 年，美国独立战争就开始了。这次战争使英国人付出了丧失它在加拿大以南的北美属地的代价，但是却给了英国人一次有力的教训：必须怎样来对待强有力的、被现代民主精神所鼓舞的殖民地。英国能使它所拥有的三大移民殖民地保持对它的效忠，应该归功于上述教训，而不应归功于支配着现代帝国主义的精神。

在美国摆脱英国统治之后，加拿大诸省还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仍然是无关重要的地方。在剧烈的内部斗争中，它们才慢慢地排除了遗留下来的封建关系，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民主权利，直到 1867 年终

于能統一成一个几乎是独立的联邦国家。然而，只要在美国还有足够的空地来发展那种粗放經營的农业，加拿大的經濟发展就仍然是緩慢的。現在美国的土地，虽然还远未耕种好，但是已經如此充分地被占有，以致于农民必須支付越来越高的地价并且以深耕細作的方法来經營。于是那些想要經營农业的移民，在加拿大发现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从此以后，移入加拿大的移民数目就不断增加，人口迅速增长。在十年之內，从 1901 年到 1911 年，加拿大人口从五百万以上增加到七百万以上，而在从 1871 年到 1901 年的三十年里，它的人口只从三百六十万增加到五百四十万。

很长时期內，好望角所具有的重要性甚至比加拿大还小。它只是作为駛往印度的船只的中間站和休息地点。葡萄牙人首先把好望角作为这种地点而加以占領的，然后它被荷兰人占据，最后在 1795 年，英国人从荷兰人手里夺得了它。移入的移民仍然很少，甚至当 1867 年在金帕萊附近发现的产量丰富的金剛石矿以及随后不久在邻近的德兰士瓦发现的产量同样丰富的金矿之后，移民人数也只有少量的增加，因为这些富藏已經在用資本主义方式靠工資劳动者加以开采。人們宁願雇用有色人——卡斐族人或中国人来当工資劳动者，而不那样願意雇用欧洲人，欧洲人提出的要求較高，而且在炎热的气候下不能适应繁重的劳动。

南非白色居民的增加，主要應該归功于它的富饒；在南非，正如在加拿大那样，农业生产的富饒程度是非常高的。农民靠有色劳动力来經營大面积牧場經濟，以此維持生計。这种經濟使南非在卡斐族人的經營之下頗为富饒，早在欧洲人来到之前，卡斐族人就在經營畜牧业，他們有高明的智慧和体力。

这种生产方式使居民的农产品很丰富，同时却要求居民广泛地散处各地，并且促使布尔族农民力图不断地、迅速地进行扩張。在我們这个世紀(原文如此。——譯者注)的三十年代里，他們已經越出好望角地区之外，并且成立了新的共和国——橘河共和国和德兰士瓦。在那里被发现的而且从 1887 年以来由英国財政資本攫取其开采权

的金矿，使英国財政資本越来越觉得有必要把德兰士瓦兼并到不列顛国家里来，这终于在 1899 年引起了布尔战争。在这里所論述的英国各移民地区中間，布尔共和国是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并且是在怀有帝国主义思想的人士的鼓吹下所取得的唯一地区。但是既然从此以后布尔人参加了不列顛共同体，而且在其中并不形成任何敌对的異族单位，那末这就不应该归因于帝国主义暴力政策，而应该归因于与此相反的做法，归因于美国脱离的冷酷教訓向英国人所提示的政策：給以最充分的自治，借此阻止正在爭取解放的殖民地完全脱离英国，甚至更牢固地束縛住它。

除了加拿大联合省联邦和澳大利亚联邦之外，1910 年还添加了南非自由民主邦联邦；德兰士瓦、橘河邦連同納塔爾和好望角都参加了这个联邦。它的社会性质当然与上述两个联邦的社会性质是不一样的。在加拿大，正如在澳大利亚那样，原来的居民只构成一种沒有重大意义的正在絕迹着的少数民族。在加拿大，1910 年时在 7,200,000 居民中只有 111,000 印第安人，在新西兰，1911 年时白人与毛利人的比例是一百比四。澳大利亚大陆上的原来居民沒有精确数字，无论如何是为数很小的。

反之，在南非，白种人則到处都构成少数，1911 年时，白种人只有 1,276,000，而有色人則有 4,697,000，其中土著人 4,020,000。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数目在下降，而在南非，土著人的人口則比白种人口增长得快得多。1904 年时，白种人还占人口总数的 21.6%，而 1911 年时，就只占 21.4%。同时，有色人种，卡斐族人、霍屯督族人和混血人并不像澳大利亚的原来居民那样还处在人类发展的初級阶段。他們是有力和聰明地爭取在国家里享有平等。这就是南非的最重要問題所在。它与帝国主义沒有关系。恰恰是与帝国主义交过战的布尔人，是最反对給土著人以权利的。

虽然这个問題对于南非的前途是如此的重要，但是在目前的有关論述中，我們不需要去探討它。

这里的關鍵在于：在向爱尔兰移交国内治理权这件事开了端之

后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联邦国家的联合王国，又同其他三个联邦国家结成了国家联盟，这个联盟对于英国资本在其领域内的扩张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可能性。帝国主义的需要，对于这个联盟的形成毫无疑问也是发挥了作用的，但是赖以建立这个联盟的地域的获得，除了布尔共和国是例外之外，都是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一百年就完成了的，而且这个联盟的紧密联系不是用帝国主义暴力方式强加于英国属地的，而是用与这种方法相反的方法，用民主的吸引力，用一种在这里立即就要叙述到的与英国本部的自由贸易的方法，来使那种紧密联系成为一切参加国的需要。

这种国家联盟毫无疑问是一种最有前途的组织形式。它恰恰对于我们这个帝国主义时代还提供了重要的教训。但是不能就简单地在殖民地去模仿这种做法，理由是除了热带以外，在那些其气候许可欧洲人能不损害健康而从事体力劳动的地区内，再没有还可以让欧洲国家任意加以占领的国家了。

因此，不列颠殖民帝国的这一根支柱的建立，是任何其他殖民国家都不能效尤的。英国也许会有一日丧失这根支柱，但它决不会去支撑另一个殖民帝国。加拿大也许有一天会认为，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比成为不列颠国家联盟的一部分更有利些。南非可能成为非洲人的独立国家的起点——但是这些地区决不会再变成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地。

乙 东 印 度

不列颠殖民帝国的举世无双的第二个支柱是英属印度。

它的人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它的三亿二千万人口超过了除俄国以外的整个欧洲的人口（三亿一千万）。而且，自然界还赋予印度十分丰富的物产资源，印度的居民在艺术技巧和哲学方面达到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方式和方法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把哲学水平与资本主义水平联系起来，也许显得很奇特，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也可说是它最重要的创造，就是它的自然科学的方法

和成就。当欧洲人在十五世紀到印度时，印度人在許多方面可以为欧洲人之师。当然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全部居民。印度不仅在人口数目方面，而且在面积方面也超过除了俄国以外的欧洲，它所使用的交通工具要比我們这个大陆原始得多，它所包含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比欧洲复杂得多。人們可以在印度看到还处在我們所知的最低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人（錫兰島上的維达人），看到从这个阶段起一直到資本主义阶段的各个发展阶段的人。

印度盛产其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料，并且还拥有大量熟练的和願意劳动的劳动力，所以这个幅員辽阔的地区出产它所需要的一切，并且有大量为一切文明民族所急切需要的剩余产品，而印度則不需要从其他国家取得任何产品。結果，印度的出口长期几乎完全由別国用貴重金屬来支付。自古以来，黄金就經常流入印度，并在印度累积成財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自从人类有历史記載以来，对于好战而貧穷的邻国來說，印度一直具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强烈引誘力。不断有各族人民进入印度，結果就产生一种在种族、語言、階級、宗教方面令人难以置信地复杂的局面。如果迁入的移民足够强大，那末他們就作为征服者和掠夺者而来。但是印度太富于吸引力了，以致于他們不願意再离开印度。他們就留在那里，他們所掠夺的財富也随之留在那里。而劳动階級的状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們只换一换主人而已。他們沒有越出原始民主的阶段。村社是賴以建立国家制度的細胞。村社中的极充分的民主，与国家中的极端的专制主义相适应，这种国家是完全靠武力来維系的；正如它易于用武力統一那样，它也容易分崩瓦解，而人民群众觉得这与他們沒有多大关系。

当欧洲人从海上来到印度时，就发生了变化；他們前来的目的起先是为了进行貿易，但是后来，当他們意識到他們在軍事上的优越性的时候，便进行掠夺和征服。首先，在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来到印度；十七世紀时，荷兰人来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則跟在荷兰人之后到印度。在一直持續到拿破侖战争时期——拿破侖自己曾經用对埃及的远征来威胁英国在东印度的統治——的长期斗争中，英国人始終能

胜过他們的欧洲竞争者以及当地的富有者。

然而，欧洲人不像以前的征服者那样是为了在印度定居而来的。若要定居的话，那里的气候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太可怕了。人人都是为了尽量多地搜括并且把掠夺物带回欧洲而到印度来的。新的征服者这时对劳动群众的压迫远远超过昔日的专制统治者对他们的压迫。印度越来越衰落下去；近几百年来，英国政府才努力来挽救这种衰落，这一部分是迫于被征服国里日益增长的反对，同时也迫于这种恐惧：否则生金蛋的母鸡就会夭折。

为了这些金蛋，确实是值得作这番努力的。英国年复一年地从印度无偿地取得约五亿馬克。印度的出超额是十分巨大的。以百万馬克为单位计算：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进口总额	1517	1637	1715	1958	1850	1768	1927	2086	2407
出口总额	2228	2290	2493	2495	2167	2636	2947	3208	3478
出超额	711	653	778	537	317	868	1020	1122	1071

出超的数额年年都有不小的波动。平均每年出超达七亿八千六百万馬克。其中一部分是交给那些运送印度货物的航运公司的运费，另一部分是在东印度投资的外国资本的利息和利润，这些都是由于经济关系而产生的、不是直接由于政治依附关系而产生的缴纳。但是最主要的一部分是印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统治国呈缴的贡税。在二十年以前，在总数为十六亿馬克的印度岁入中，每年就有四亿馬克流入英国。

还应该注意的是：印度进口中有一部分不是用商品换来的商品，而是作为外国资本在印度进行投资的货物，以便在印度生产剩余价值并据为己有。在过去六年里，这种资本输入每年平均达二亿馬克。如果把这个数额从进口总额中扣除，那末在印度卖给外国与它从外国买进的货物之间的出超额就从七亿八千六百万馬克提高到十亿馬克左右。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经济统治，特别是由于资本输入而取得

的，这是不断增长的一部分，但是还有更巨大的一部分是由于政治統治关系而取得的。

这当然是英国首先要归功于其海上霸权条件才能享有的。是对印度的占有，而不是英国的貿易兴隆和工业繁荣，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英国海軍。对于英国統治階級說来，英国海軍的优势确实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問題，因为印度的突然丧失和每年从印度攫取的十亿巨款的丧失，对它說来就意味着破产。

既然这种轉变会带有危机性质，它就势必会严重損害英国工人階級的利益。对于剝削印度这件事本身，英国工人階級就其整体說来是不感兴趣的。个别的工人阶层，譬如說高薪工人，到处都是对剝削感兴趣的。由于剝削印度的巨大規模，这类工人的人数在英国毫无疑问是增多了。然而，如果印度的农民，不是陷入貧困，而能把那些为繳納国家賦稅而撥出的款項用来改善他們的經營，用于购买一些英国耕犁和器械，那末，英国对印度的貿易和工业品出口也許不会下降，也許甚至会增长。

使英国工人階級目前所以对英国海軍优势感兴趣的，是另一种情况。这不是那种要用武力来占据外国剝削地区的需要，而是一种怕一旦发生战争冲突时会挨餓的恐惧。英国目前自己只生产很小一部分食物。仅小麦和面粉，英国每年就要輸入大約五十亿公斤，这相当于英国小麦消費总額的百分之八十四。因此，海上貿易的中断，对英国說来就意味着饥荒。这个危机只能用这种方法来避免：即英国使农业从一种单纯从利潤考虑出发来經營的私营經濟部門变成社会性企业。用社会主义方式来經營的农业，在取消土地所有制之后，能够如此地提高英国的农业产量，以致于它即使在战争情况下也不用害怕挨餓。只要英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英国工人階級就会关心于使英国的海外貿易不受制于任何国家，尽管工业的繁荣只在如此小的程度上取决于英国的海上霸权，尽管工人对帝国主义的征服目的是如此缺乏热情。

在統治階級里，对强大海軍的兴趣当然是另一种兴趣。在这方

面，維持对印度的統治，也許是最重要的动机。自从十八世紀以来，它一直构成英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英国在非洲和亚洲进一步扩展它的殖民帝国，首先是为了这个目的：确保前往印度的通道。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占領南非以及后来在苏伊士运河开放之后的占領埃及等等，都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誰威胁了印度，誰就是英国的现实的敌人。在十八世紀，法国看来就成了这样的敌人。拿破侖的以印度为目标的远征埃及，就使他在英国成了最被人深恶痛絕的人物。

在英国的海上霸权被确保之后，就还只有一个国家威胁着印度；唯一能从陆路接近印度边界的国家就是俄国，俄国同时还力图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于是俄国就成了“世仇”，而昨日的“世仇”法国却变成用以反对拿破侖战争时期的同盟国的同盟国了。再也沒有什么东西比外交政策中的敌对关系和同盟关系改变得更快的了；再也沒有什么东西比这种企图更缺乏远見和不可靠的了；即想把这类敌对关系归因于持久的因素，归因于諸如民族的或种族的特性和恶感之类的因素。

然而对俄国的敌对情緒在英国各个階級中間不是一致的。各工业階級对于占有印度的兴趣并不大，虽然它們也必然会希望这种占有不致于在一种势必极其严重地震撼整个社会机体的突然灾难中告終，而是以一种逐漸撤退的方式結束。在对印度政策和对土耳其政策上，前一世紀的英国自由貿易者就不及保守党那样敌視俄国。随着大工业、財政資本和大地主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自由貿易者溫和傾向的一面也就越来越减退，坚持占据印度对于英国統治階級來說也就又取得了更带普遍性的意义。

但是，对于印度帝国的主人來說，同时在印度民族反对力量的觉醒方面也出現了严重得多的新危机。

只要印度还没有越出原始民主的阶段，英国的統治者就一直不用害怕发生任何反叛。个别的不滿阶层或地区也許会憤然起来反抗压迫——但是無論它們可能显得何等的危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总能解决这种地方性的反叛。

但是資本主义終于不仅給印度带来了它的剝削，它还带来了交通事业、邮政、铁路、新聞事业等等。它从而建立了印度各地区之間日益密切的持久关系以及民族意識和民族民主的基础。政治方向、政党和組織就产生了，它們在全国寻求拥护者，討論全国的事务，力图对这些事务施加影响，并且用一种民族的也即包括整个国家領域的反对派来同中央政府相抗衡。

当然居民之間的階級矛盾并不因而就告消除，即使反对派人士也許会认为，他們是一視同仁地代表着整个民族的。起先，各个階級也还没有觉悟到要有一种民族生活。农民群众，同样还有城市无产階級，还太愚昧无知，以致于不能理解除了眼前的地方利益以外的任何事情。反对运动几乎不能超过俄国在四十年以前所做到的程度。直到現在，这种运动主要是由有产階級和城市知識分子来推动的。它的主要机构是印度国民大会，它从1885年以来每年举行一次，并且是作为一种印度議會——当然直到現在它除了道义上的权力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权力。每年举行一次的省級大会和一种迅速发展着的新聞事业和免費学校支持着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百到一千名政界領袖人物組成，它包括貴族、地主、邦參議員、乡鎮參議員、地方法院法官、科学研究员、工程师、銀行家、商人、店主、教員等等。印度教徒、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依次輪流主持这个大会。它的討論具有敏銳和溫和的特点。”（亨利·戈登爵士著《新印度或轉变中的印度》第8、9頁，倫敦，1907年出版）

印度民族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溫和，是不符合整个民族反对力量的心意的。政府采取越来越厉害的暴力措施来对付这个反对力量，其結果与四十年前俄国政府所获得的結果一样：一部分反对力量变得越来越激烈，并且被迫用反对派的越来越强烈的暴力行动来对付越来越厉害的鎮压行动。叛乱性的恐怖主义流行起来，这种恐怖主义当然又会像在俄国那样，由于它那种絕望的暴力行为而在人民中間暴露出它的地位的軟弱性。个人暴行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完全孤立

的、随时都有毁灭之虞的小集团的斗争形式，而不是要争取群众支持的、指望群众赞同的、要通过群众来发挥作用的政党的斗争形式。

现在战争已经爆发。在战争中，交战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指望对方发生叛乱。正如在世界各地一样，叛乱在印度帝国一直也还没有发生。甚至在印度，它突然之间使激怒的反叛者变成了忠实的爱国者。一系列最坚决的民族反对派的报纸宣称：在战争期间，停止进行反对。印度国民大会一致宣誓效忠。这种情况怎么会发生的呢？

印度民族主义者毫无疑问正在坚决争取摆脱英国的枷锁，但却不是以这种方式：即用另一个枷锁来交换这个枷锁。他们明确认识到：他们还只是构成了薄薄的一层，如果英国的统治宣告结束的话，单靠它本身还没有能力把整个国家维系在一起。人们考虑到，这里所涉及的是在面积和人口数字方面都超过除了俄国之外的欧洲、甚至比欧洲还复杂的一个国家，同时它的群众还没有超出原始民主阶段。这个国家将会四分五裂，成为许多专制国家，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一定的民族疆界，彼此之间互相猜忌和不信任，彼此很容易卷入战争，这些战争正如在十七和十八世纪那样又要依靠欧洲国家的帮助才能打下去，并且又会把这些欧洲国家送到统治地位上去。永远不停的战争，国家的分崩支解，受到不是一个外国而是好几个外国的统治者的奴役——印度民族主义者害怕，这将会是英国统治的结束所首先意味着的后果。

目前，英国的统治给这个巨大的国家带来了一种稳固的和平以及一种用欧洲尺度衡量起来微不足道的军事负担。英国人所建立的常备军在和平时期拥有兵员 236,000 人！(1912 到 1913 年时，英国人占 76,000，印度人占 160,000) 印度人诚然要为和平以及为这支不大的军队支付许多金钱，但是只要看一看欧洲就足以向印度人表明，按欧洲方式来实现民族独立，可能要付出多得多的金钱的代价。

在这个巨大国家的内部，也没有像欧洲那样到处林立的关卡。同时，英国语言和英语课程已经成为有统一力量的民族纽带。各式各样的宗教、种族、语言的知識分子都学会了英语；在他们相互会面

时，英語提供了互相了解的工具，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斯拉夫人 1848 年时在布拉格會議上为了互相交談不得不讲德語那样。

因此，印度民族主义者努力的目标首先不是脱离英国，而是在不列颠国家联盟之内争取較多的自由，争取民主权利和省的以及全国性的議會代表机构，这种机构能够頒布規定稅收种类和稅款用途的法律。他們的最終目标是一种有些像澳大利亚宪法那样的宪法，而且他們还相信，如果爭取到这种宪法，那末繼續留在不列颠联邦里就只会得到好处。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印度联邦——印度合众国，它与加拿大联邦以及澳大利亚联邦和南非联邦一起团結在联合王国的周圍，并且組成一个举世无双的国家联盟。

事实上，这是一个偉大的目标，它对于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发展可以有极其巨大的意义。当然，問題在于这是否能够实现。但是，威胁着这一目标的危險不是来自外界的別国，而是来自英国帝国主义者的暴力政策。他們不会心甘情愿地放棄他們年复一年地从印度攫取的大量掠夺物。直到現在，他們一直在用越来越殘酷的鎮压措施来对付日益壮大的民族反对力量。但是这却是一种把印度反对派逼到絕望情緒中去的做法，在这种情緒中，印度反对派将对任何能使他們脱离英国的办法都表示贊成，将对英国的任何挫敗都欣然欢呼。而且人們不要忘記，虽然民族反对派的力量还是薄薄的一层，但是它的增长却是迅速的。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他們的自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喚起了对民族問題的興趣。目前的战争由于在欧洲大量使用印度軍隊，将必然会更强有力地朝这个方向产生影响。在战后，反对派将以一种比以前更豪迈和更强有力的姿态出現，如果它在战争期間能够在支持英国統治的宣傳面前坚持自己的目标，不作退却的話；这样，他們就能获得群众的信任，并从而由群众中汲取力量。

印度到那时是否还会长期不脱离英国，将在不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战后在英国会有多大力量的支持。工人階級是坚决敌視这种政策的。而且在英国知識分子和有产階級中間，十

七世紀革命和十八世紀美國的脫離給他們的教訓還記憶猶新，而且這個教訓還造成了這種情況：十九世紀時世界上沒有任何階級像英國統治者那樣懂得，要用及時的讓步來挫斷一切革命運動的鋒芒，而不是用暴力鎮壓來驅使革命運動發展到極度。這倒不是因為他們不熟悉暴力方法和沒有採用過暴力方法。在他們認為可以把不順眼的反對派在幼芽時代就加以扼殺的時候，他們是會肆無忌憚地採用暴力方法的。但是自從美國獨立戰爭以來，他們迄今為止總是懂得確切地判明，什麼時候一個運動已變得無法抵擋的了。這時，他們就設法通過讓步來收買它和腐化它，或者讓它放棄暴力方法。

因此，作為不列顛世界帝國一部分的印度合眾國還會成為事實，這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出現了這種情況，那末這不應該歸功於帝國主義，而應該歸功於英國和印度兩國民主力量的制服帝國主義。

要爭取或建立這樣一種世界國家的願望，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的帝國主義者來說都是顯而易見會有的。但是英國這個世界國家能否作為一個持久的制度而存在，還不能完全肯定，然而有一點倒是肯定的：即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夠建立這樣一個世界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印度。它可以不再成為英國屬地。它決不會作為一個完整的國家而淪於另一個外國統治之下。

丙 非洲

當大約一世代以前那以爭奪殖民地、資本輸出和農產品保護關稅和工業品保護關稅相結合的制度為其特徵的帝國主義時代開始的時候，英國雖然是最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決沒有率先採取主動。英國誠然必須越來越增加它的商品出口並且用資本輸出來開拓農業地區，但是巨大的利益，首先是在英國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強大的工人階級和航運資本家的巨大利益，却阻止英國實行保護關稅，並且迫使工業資本設法用自由貿易的方法來實現進一步的擴張，雖然由於與財政資本的聯繫日益密切，工業資本是傾向於採取帝國主義方法的。而且，英國業已占有的兩大地區，印度地區和各個移民殖

民地区，对英国提供了輸出資本的广阔余地，因此英国沒有迫切的理由要用武力来爭取获得新的殖民地。

寻求更新的殖民政策的动力并非来自英国，而是来自法国。但是就是这最初的推动起先也只带有微少的帝国主义性质。我們早在以前就已經看到，除了帝国主义之外，还有促使国家扩张的其他动机，其中包括最原始的追求单纯扩大領地的动机；由于統治階級用武力勒索貢品，这种領地能保证直接增加統治階級的享受和权力手段，而毋須任何生产方式的要求在这方面起作用。我們还看到，力图扩大对那些处在原始民主阶段的地区的剝削，也是一个单纯的暴力問題。

这种剝削的努力，虽然是最原始的，但是它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整个历史中曾一直是起作用的，并且在当今的扩张运动中也发挥着作用，其主要形式是努力增加有利可图的官职，作出这种努力的是那些掌握現代中央集权国家的統治机器——官僚机构和军队——的人物以及被召募来构成統治机器成員的各个階級——知識分子、小资产階級和农民。

我們已經認識到这是俄国扩张性努力的很有力的推动力。它还同样强烈地影响了前一世紀初叶的法国拿破侖主义的扩张努力，拿破侖主义首先是以军队和官僚机构为支柱的，这种军队和官僚机构的全权地位不再像在封建专制統治下那样受到特权的封建貴族和教会的損害。保持军队和官僚机构的昂扬情緒，这是拿破侖主要关心的事。他必須不断地向他們提供新的发财致富的泉源，提供新的战利品、新的官职、新的物資供应，同时財政資本也兴隆起来。这就驅使他不断从事新的征服。在1812到1815年間，帝国崩潰之后，要在欧洲再进行新的征服在长时期內已經完全不可能。然而建立在帝国廢墟上的君主政体却感到很不稳定，因为革命傳統当时在人民中間依然还发生着影响，而且由于資本主义所固有的階級矛盾的加剧而增加了力量。对于这个王朝來說，军队和官僚机构变得越发重要了。但是用什么办法来向他們提供足以使他們心滿意足的战利品呢？

因为在欧洲的扩张已不再可能，就必须试图在欧洲以外的地方进行扩张。正当波旁王朝的反对力量日益增长的时候，这个王朝在1827年发动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这次战争在1830年7月导致了阿尔及尔市的投降。这当然不能阻止7月革命和波旁王朝的被推翻，但是阿尔及尔依然是法国的属地，这对于为了维持这个属地而必须支付千百亿巨款的法国人民毫无好处，然而却有利于许多谋求高官厚禄者及其有势力的朋友们，这些人要求法国任何政府给以庇护。

后来，第二个拿破侖力图重新恢复拿破侖一世的传统，即用战争来保证对军队、官僚机构和商人提供新的利益和职位。它最终获得的结果是十分惨痛的。

共和国于是代之而起，这个共和国不是由于反对帝政的国内起义，而是由于其外部的崩溃而建立的。因此，共和国根本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根本没有实现用民兵军队来替代常备军队，用乡镇自治和分省自治来替代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共和国从王朝那里接收了这两套机构；它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镇压要认真实行激进主义纲领的巴黎公社并且巩固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统治。

于是，共和国又面临着与以前王朝所面临的相同的任务：扩展领土，以便提供新的职位。在欧洲进行扩张已经不可能了，因此它力求在原始民主的国家里取得新的领土。

八十年代开始以来，法国开始实行强有力的殖民政策。1881年，它占领突尼斯；1882年，它派兵远征马达加斯加，同时开始了争夺东京（越南北部。——译者注）的战争。从此以后，法国占据了大片领土，特别是在非洲。在1871年，法国在非洲的属地被估计为九十万平方公里。今天，法国属地约达六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包括马达加斯加），这还没有把四百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势力范围”计算在内。法国在非洲属地的居民总数在1871年只有三百万人，目前则达三千三百万人。

这种扩张运动的出发点还不是帝国主义性的，但是在它的后来

的过程中則越来越带有帝国主义性质，它越来越变成那个与工业大資本融合在一起的財政資本的工具。最近的摩洛哥危机十分明显地暴露出这一点。

紧跟在法国的后面，在八十年代中期，德国也被追求殖民地的要求所左右，德国政府长期以来只是勉强地对这种要求作出了让步。德国政府犹豫地在 1884 和 1885 年才把那些由私营公司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取得的地区置于其保护之下。所以英国在九十年代初期还不感到德国的威胁，在 1890 年还願意把海尔哥兰让給德国，以换取桑給巴尔。德国首相卡布里維在闡述交換領土的理由时认为，如果把整个非洲都送給他的話，那末对他說来这是再糟糕也沒有了。

自从 1894 年以来，情形当然就完全改变了。从那以后，在德国政府里以及在有产階級中間和在知識分子方面，对殖民地的兴趣都大大增加了，然而殖民地的占有量却沒有以同样的程度增长。1890 年时，德国保护地拥有 2,235,000 平方公里，其中几乎有二百万平方公里（确数是 1,980,000）在非洲。現在，保护地面积已增加到将近三百万平方公里（2,952,000），其中 2,700,000 平方公里在非洲。当然，与面积为五十万平方公里的本国幅員比較起来的話，这是一片巨大的領土。被統治的居民的人数增加得更快。1890 年时，人們估計这种居民总数为二百万人，其中一百五十万在非洲，現在連同最近取得的領土，这个数字几乎达到一千三百万左右，如果不算最近取得的領土，則人数在 1912 年是 12,260,000，其中 11,400,000 在非洲。

殖民的宣傳越来越多了，同时对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軍的兴趣也随之日益强烈；海軍在 1898 年便开始迅速扩充。

正当法国和德国过渡到夺取殖民地阶段的时候，这两国同时也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英国則仍然忠于自由貿易，但是也正力图仿效法国和德国的榜样，尤其是要在瓜分非洲时夺取相当大的一片土地。起先主要是为了确保穿过苏伊士运河通向印度的通道而实行的占領埃及以及对南非的占領，这两者对英国的財政資本家提供了出色的跳板，因此它不久就获得了巨大的进展。

除去那个在名义上还不属于英国的埃及不算外，英国的非洲屬地在 1890 年約有二百萬平方公里，現在則达到將近六百萬平方公里。被統治的人口从四百五十萬增加到三千三百萬。

在非洲以外的地方，英国的殖民地扩展得很少。

按面积来計算，这三个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屬地都是非常大的。然而它們的居民还十分落后，生产方法极其原始，劳动生产率很低，甚至用非人道的剝削方法也只能产生很少的剩余价值。

所以，經濟上的成果，同这三个以帝国主义为动力的大国迄今为止为了扩大和巩固它們在非洲的屬地而付出的力量和資金是决不相称的。

在 1912 年共值 6,234,000,000 法郎的法国出口总額中，只有 108,000,000 法郎輸往法屬西非、中非、馬达加斯加和索馬里兰。而法国对比利时一国的出口就十倍于此(1912 年达 1,024,000,000 法郎)。在法国的 7,172,000,000 法郎的进口总額中，来自这些非洲屬地的进口占 119,000,000 法郎，而来自比利时的进口則达 543,000,000 法郎。

德国与非洲殖民地之間貿易額的微小是人所共知的。在共值 10,770,000,000 馬克的德国进口总額(1913 年)中，来自德屬非洲的进口占 42,500,000 馬克，同时在 10,097,000,000 馬克的出口总值中，对非洲德国屬地的出口只占 52,000,000 馬克。

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国，也只从它的非洲屬地——指那些在帝国主义时代中成为殖民地的而言，但德兰士瓦除外——获得不多的利潤。在 1912 年，英国总共輸出本国产品 487,000,000 英鎊，折合 9,740,000,000 馬克，非洲各屬地所占份額如下：

东非地区	1,241,000 鎊
罗得西亚和巴士图兰	863,000 鎊
尼日利亚	5,065,000 鎊
共計	7,169,000 鎊

由此可見，这种在非洲的成就只使英国增加了略多于一亿四千万馬克的出口。

如果把那两个实际上不是殖民地而是联邦的黄金产地德兰士瓦和橘河自由邦计算在内，那末英国对这两个地区的出口额（英国产品的出口）的确增加了近一倍，1912年是6,637,000镑。如果没有这两个地区，那末帝国主义时期在非洲的收获对英国说来将会是微不足道的。埃及的情况当然不同，埃及在1912年容纳了总值九百五十万镑的英国产品的出口，约折合二亿马克。原来的移民殖民地好望角和纳塔尔也是这样，它们购买了一千四百八十万镑的英国货物，折合三亿马克。然而，后两个地区同德兰士瓦和橘河殖民地一起都属于不是通过帝国主义方法而取得的地区。

尽管大多数非洲属地对于宗主国的工业说来只有比较微小的意义，但恰恰是争夺非洲地区的竞赛在不小的程度上推动了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并且使欧洲好几次临近世界大战深渊的边缘。然而各参与国每每在决定性的时刻总还是发现，为这个目标不值得付出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牺牲，并且彼此达成了谅解。在1898年，法国人占领苏丹的法孝达而英国人对他们予以迎击的时候，情形就是这样的。此后不久，英国和德国之间似乎要为了布尔共和国而发生一场战争。最后在1911年，三大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为了摩洛哥问题而尖锐到这种程度，以致看来为了这个争执地区打一场世界大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世界大战这一次仍然还是避免了。从此以后，在非洲再也没有发生过丝毫要在目前这次战争中来解决的冲突。目前，在非洲不存在那怕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值得进行一次世界大战的利害冲突。目前对欧洲资本主义说来在经济上有价值的仅有的地区是：南非和埃及以及阿尔及尔。南非已经达到现代民主阶段，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不能用暴力的方法来取得和保持它。埃及显然正在接近这个阶段。如果出现一种许可埃及摆脱英国枷锁的条件，那末埃及也会懂得反抗任何其他的枷锁。这种情况也适用于阿尔及尔。这些地区不再可能被当成帝国主义争端的标的物，当作可以被胜利者任意加以支配的毫无自己意志的民族。

丁 中国

如果我们撇开南非和埃及，撇开那个从 1830 年以来法国对它所投入的金钱超过法国在 1871 年作为战争赔偿而向德国支付的款项而且它同时还要求法国不断给以巨额贴补的阿尔及尔，那末我们就会发现，在帝国主义征服政策所瞩目的地区中间，中国对于世界市场和资本输出来说是最重要的了。如果不算刚才提到的这些地区，那末非洲在 1909 年的进口总额是九亿五千万马克，而中国（连香港在内）的进口总额是十二亿马克。

把对中国和对非洲的资本输出加以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阿斯凯夫所采用的材料，英国对中国以及对除了印度、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外的所有英国殖民地（包括西印度和海峽殖民地在内）的资本输出数字如下（单位：百万英镑）：

	中 国	殖民地
1908	5.0	7.4
1909	7.7	9.9
1910	1.6	20.7
1911	7.4	10.9
1912	6.0	4.6
1913	6.9	3.3

由此可见，在最近几年里，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大大超过了对那些主要应该归因于帝国主义而取得的殖民地的投资。

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一定会迅速增加。非洲的面积等于中国的三倍，但是非洲的人口只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中国的人口几乎等于连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的人口。同时，中国劳工的生产力，也就是他们能生产的剩余价值，则远远超过非洲劳工的平均生产力。正如印度工业一样，中国工业在资本主义侵入以前就已经达到用资本主义以前的技术——主要是不用机器——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同时，中国居民的主要部分——不算边远地区——的文化水平，比起印

度居民来，要平均得多；而且，中国人之所以超过印度人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水平比起印度农民来要高得多。在有些欧洲观察家看来，中国的农业由于其精耕細作甚至在今天还是堪称模范的。毫无疑问，中国的农业意味着小农經濟在不应用现代科学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在其国家制度，也就是在其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方面，中国的高度发展的广大居民群众一直还处在原始民主的束縛之下。对于西欧大国說来，要成为中国人的主人，似乎是与征服印度一样的容易，而且其战利品也是同样地富于引誘力的。由于中国的軍事制度完全是过了时的，其軍事意义几乎等于零，所以征服中国就显得越发容易了。因为走陆路有沙漠和高山做屏障，走海路則靠不完善的航海技术几乎无法达到中国，所以这个巨大的居民群在好几百年来一直不知道有强大的敌国，一直完全从事于和平营生。

直到有了汽輪航运，人們才有可能把較大量的軍隊从欧洲运到中国，从而威胁了这个国家。但是这些軍隊几乎还没有力量来征服和控制这个大国。而且，正当一个欧洲国家有可能同中国进行战争的时候，在海上称雄的英国却有人首先考虑到要使产业資本用它的自由貿易观点来取胜。英国的目标不是征服中国，而是打开中国的門戶，它直到今天还坚持这种方針，正如坚持自由貿易那样。虽然有种种帝国主义特征，但英国資本却相信，維護門戶开放原則可以在中国做最好的生意。英国在这方面获得美国的支持。不被表面現象所迷惑的冷靜权衡利害的人則十分清楚地知道，像中国人这样高傲的居民的市場是不能用大炮来取得的，而要一方面用更低廉的价格，另一方面用信任来取得。单单靠廉价还做不到这一点；一种从敌意中产生的抵制，可以在长时期內使廉价丧失其在其他情况下如此无坚不摧的威力。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奉行英美两国对中国的那种策略。俄国、法国、日本对中国給以惨痛的打击，并且夺去大片中国領土。但是这两个盎格魯薩克森大国却守卫着这个国家的要害地区。针对中国和爭

夺中国的战争本身，只能产生一种加速中国现代化的结果。战争促使这个“中央之国”去建立现代化的军队，设置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修筑铁路。传播很广的新闻事业迅速发展了起来。中国用这种交通工具和增进了解的工具来保障自己，比用军队更加有效。军队是可以被击败的；那种由于现代化的交通事业而在中国兴起的民族精神却是不可克服的，这种精神正在用现代民主的思想来取代原始民主的思想。长远看来，这种精神同外国统治终究是势不两立的，并且要对后者进行无法抵擋的反抗。如果说这一点对于一个欧洲民族对一个毗邻的小民族实行的外国统治就已经适用的话，那末它将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适用于对如此巨大而且距离欧洲如此遥远的民族实行的统治。

在中国，用共同的民族感情来克服各种较小的、地方性的、语言上的、社会性的、宗教上的集团的分裂主义，要比在东印度迅速得多。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像中国那样厉害的对宗教的漠不关心态度，那样明显地不存在由于出身不同而引起的差别。而且这个十分巨大的居民群众都讲同样的语言。当然，由于迄今以来彼此之间交通的落后，这种语言分化成许多地方性的方言，这些方言之间的差别是如此的大，以致于彼此之间口头的交谈也许比说北德方言的人与说瑞士德语的人之间的谈话更难讲得通。

另一方面，还有中国文字的特点。由于这种特点，每个字所表示的不是一个音，而是一个概念，正如我国的数字符号那样。数字符号在每种语言中读音各不相同，但人人对它们的理解相同。学会中国文字要比学会欧洲文字难得多。如果有谁学会了中国文字，那末他就随之而获得了与一切通晓中国文字的人沟通交往的工具，即使不懂得他们的语言。共同的文字从而就成了民族联系和民族沟通的强有力的工具。而且，在欧洲，书面语言也是克服方言的地方分裂主义的工具。如果没有书面语言，没有阅读和书写，我们就几乎不会形成一个民族国家。

在这一点上，中国也比印度情况好些。中国的国民教育事业比

印度发达些。

因此，从原始民主向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或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民主制度过渡的条件，在中国要比在印度有利得多。但是人们也许会考虑到：欧洲将会成为一个何等巨大的国家，如果它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话；人们就可以权衡一下：中国将会壮大成为一支何等巨大的力量——姑且完全不谈它在军事上的战斗能力。单单这样的人民群众压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压力，就足以博得人们对它的尊重。

这种经济压力现在已经出现，并且将一年一年地愈益增长。

对于中国对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展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几乎都不会过高的。但是对于一切欧洲国家来说，在中国实行任何帝国主义政策都是越来越不可能的事了。日本想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的企图，很容易会导致日本与中国融合成一个民族整体。

戊 土 耳 其

除了以上所论及的国家之外，就只剩下土耳其和波斯是帝国主义的仅有的目标了。为了避免叙述过于冗长，我们姑且不细谈波斯，正如在我们论述非洲情况时没有更详细阐述埃及和阿尔及尔那样。正如关于印度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埃及而且在较小的程度上也适用于阿尔及尔那样，这里关于土耳其的阐述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波斯。

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土耳其在商品贸易上的重要性是比较小的。在德国统计年鉴的国际概述中，世界较重要国家的对外贸易表格中没有提到土耳其，尽管在表格中列入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哥斯达黎加之类的国家。然而，土耳其还不是如此完全无足轻重的。根据《政治家年鉴》，1911年土耳其进口共值三千七百八十万英镑（折合七亿六千万马克），其出口共值二千二百五十万英镑（折合四亿五千万马克）。这个统计数字当然不会是不可靠的。根据德国全国统计，德意志帝国1911年对土耳其的出口共值一亿一千三百万马克，然

而土耳其的統計則把來自德國的進口記載為共值三百五十萬土耳其鎊，等於六千三百萬馬克。

土耳其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份額不是無關緊要的，當然遠遠地小於中國的份額，甚至小於英屬印度的份額，英屬印度在1912年的出口總值（連錫蘭在內）超過三十七億馬克，其進口總值超過二十六億馬克。

土耳其包含着這樣的地區：它們以前屬於世界上最富足的地區之列，而且在歐洲還處在極度野蠻的生活狀態時它們已經與印度和中國一同達到了高度文化階段。這種文化從幼發拉底河和尼羅河經過敘利亞和小亞細亞傳到歐洲。在希臘，這種文化達到更高度的繁榮，並且向東方和西方進一步傳播出去。然而，希臘和羅馬及其西方和北方屬地終於又從已經達到的文化水平衰落下去。羅馬希臘文化區的東方，小亞細亞、敘利亞、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知道更好地保持已經取得的文化。在整個中世紀內，東方一直在藝術和科學方面為歐洲之師。

正如自古以來那樣，在中世紀，近東和埃及的財富就像印度的財富一樣引誘着當時愛好掠奪的游牧民族，他們有時候強大得足以在被征服的國家里作為統治階級而長期定居下來。阿拉伯人尤其如此。雖然他們在入侵時是野蠻而未開化的，但是他們大多數很快地就適應了被征服國家的文化，並且進一步促進了這種文化。

屬於土耳其民族集團的奧斯曼人卻是例外。他們來自波斯，從十四世紀以來就侵入小亞細亞北部並且向歐洲進逼；在歐洲，他們很快就在色雷斯和馬其頓定居下來。在十五世紀，他們的部落一直伸展到希臘，甚至一直伸展到匈牙利，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並且終於在十六世紀還取得了敘利亞和埃及。

人們本來可以指望，不但阿拉伯人，而且奧斯曼人——人們大多稱之為土耳其人——會漸漸拋棄他們的好戰的野蠻性，並且適應被征服國家的文化。但是這種情況沒有出現。這倒不是由於奧斯曼人的任何特殊的種族原因。人們不能貿然說奧斯曼人具有這種特殊的

种族原因，因为他们很早就同被征服的民族融合了。而是由于他们征服近东和巴尔干国家时所处的特殊历史情况。恰恰就在那个时候，西欧国家的航海技术已经发达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他们敢于从事更远途的越过大洋的航行。奥斯曼在地中海东部盆地愈是凶暴地进行蹂躏，愈是凶暴地扰乱对那里的和对印度的贸易，那末要利用已经获得的航海技术来发现通往印度的直接航路的推动力就愈加强大。所以，奥斯曼的统治对发现和殖民的时代提供了动力。

以前一直使东欧、近东和埃及受惠非浅的对东亚贸易，这时在那里迅速衰退了。由于这种情况，奥斯曼人或土耳其人在这些地区掠夺破坏所造成的影响比它原来会造成的还严重得多。丰硕的贸易收益以及由此而涌来的贡税愈是下降，征服者自己这时就力图愈来愈加紧剥削农民，以弥补那些损失。原先就由于商路转移而引起的经济崩溃，于是更加严重了，并且成为一种持久的崩溃。同时土耳其人则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受到鼓励：即不用扩大贸易的方法，而继续只用军事扩张的方法去取得新的财富。他们没有注意到，军事力量不能不取决于经济和科学的繁荣。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一种忽视甚至妨碍科学和经济进步的战争政策会使他们坐于其上的枝桠折断。

正当土耳其人在东欧和近东实行那种破坏着或者直接摧毁着一切科学和经济设施的掠夺制度，从而使其统治地区淪入蛮荒状态的时候，西欧在经济和科学方面则在迅速发展。因此，西欧就获得了逐渐形成更高级的军队制度的手段，常备军制度实行了，射击武器也愈来愈臻完善。

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有能力长期担负军事竞争所加给它们的重担。我们已经看到，譬如说，西班牙是如何受到这种负担的重压的。一个国家在经济上越是落后，它越是把军事力量看成是国际生活中唯一有决定意义的手段，那末它就越会因为军事制度的新发展而受苦。因此，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土耳其，土耳其的统治者除了战争，除了征服和掠夺之外，不知道任何其他权力手段，不知道任何其他致富的手段，而且土耳其的生产方式是如此的落后，以致于它只能提供很

微少的剩余,这些剩余不足以长期承担一支龐大軍隊的重負。

君士坦丁堡大城市生活的影響,並沒有使情況有所好轉。因為統治階級的興趣完全集中在戰爭、剝削農民以及掠奪鄰國上面,這個階級在大城市里就不能接受更高級的教育,而只能接受愈來愈嚴重的腐化。

在這種情況下,軍事力量也迅速衰敗。十七世紀以來,土耳其軍隊雖然有一個時期還能夠對奧地利、波蘭、俄國、意大利等國的經濟發展加以阻撓,但是已經不再能擴大國家的版圖。1683年,土耳其圍攻維也納,但最後被擊敗,這一年標誌着土耳其侵略最終的極限。從那時候起,幾乎每一次戰爭都使奧斯曼帝國喪失一片領土。

反對土耳其人的共同鬥爭,使奧地利帝國的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十七世紀以來它們最重要的領土擴張都是在犧牲土耳其利益的情況下實現的。同時,奧地利起先在波蘭找到了同盟國,後來在波蘭衰亡之後在俄國找到了同盟國。在1788年時,奧皇約瑟夫二世還同俄國女皇卡塔林娜二世一起對土耳其帝國作戰。

在十九世紀期間,情況就改變了。對奧地利和對土耳其說來,俄國這時已經顯得是一個強大得多和危險得多的鄰國,俄國滿懷着與土耳其軍事帝國相同的東方專制主義和軍事官僚國家的擴張企圖,但卻擁有與土耳其完全不同的和迅速壯大着的力量,土耳其這時已經被迫處於守勢。從那時候起,奧地利對土耳其的政策成瞭一種搖擺不定的政策。在奧地利的統治集團中,一直還保持着那種希望犧牲土耳其的利益來實現進一步擴張的傾向;但是在這同時,阻止俄國在土耳其的進一步推進和維持土耳其的存在,卻又越來越顯得是這個多瑙河帝國的切身利益。奧地利所扮演的歷史角色越來越不是反土耳其的戰士,而越來越是制止俄國的障礙物。

由於俄國向君士坦丁堡的進逼,土耳其在地中海國家中還找到了別的盟國——法國和意大利,還有英國;英國首先害怕俄國成為印度的最危險的敵人。它們大家聯合起來,保護土耳其不受俄國的侵犯,這一點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明顯暴露瞭出來。

俄国認識到，它作为一个征服者出现在土耳其面前是不会交好运的。它选用另外一种手段来瓦解和統治土耳其。在俄国国内，这个中央集权的专制統治不仅力图扼杀一切民主运动，而且还要扼杀一切民族特性。在土耳其，它却以相反的姿态出现，以这两者的贊助者姿态出现。它鼓励那不再能被它直接加以征服的土耳其欧洲部份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联盟，这些民族国家为了維持存在必須仰賴俄国的鼻息并且成为它的附庸国。历史的必要性迫使俄国不再用扩大专制主义統一国家的方式，而用促进一种多多少少有些民主的国家联盟的方式来設法在欧洲謀求进一步的擴張。俄国同巴尔干国家結成的联盟，是要使这些国家成为它的附庸国；这种联盟当然不能成为形式上的独立。这种联盟只是以外交阴謀和暫时的利益一致为基础的。在阴謀不起作用和利益不一致的地方，这种联盟就很容易陷于破裂。

但是对奥地利說来，这种在俄国领导下的独立民族国家出现在奥地利国境边上，意味着又一种必要性，逼着它不得不使奥地利自己的国内政策和組織机构具备一种可以增加其对內吸引力的形式。这只能是使奥地利更接近于民族自治国家(或者还有領地)联盟的那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存在着对付由于俄国对巴尔干的政策而使奥地利面临的危险的唯一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遇到强烈的反抗。

当帝国主义兴起的时候，土耳其的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因素。有內在联系的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財政資本和工业大資本，从九十年代开始以来就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頗有前途的資本輸出地，資本輸出必然会造成对土耳其的工业品出口增加和从土耳其来的原料进口的增加。土耳其各地毕竟不仅資源丰富，而且人口众多——这是主要关键——他們还很懂得劳动，只是一向缺乏可以使他們的劳动被使用得富于生产效果的物质資料以及政治和社会条件。

土耳其的亚洲部份开始修筑了铁路，人們还計劃了大規模的灌溉工程，土耳其开始从它似乎是无可救药的衰落状态中觉醒过来。

1890年，在小亞細亞和敘利亞只有850公里鐵路。1912年，土耳其亞洲部分的鐵路長度已經增加到5,200公里。

德國資本尤其積極對土耳其進行投資活動。同時，德國的政策上也發生了轉變。俾斯麥原先對於德國參加那種不值得任何波美拉尼亞武士為之獻身的土耳其事務，正如對於殖民政策一樣，都是採取同樣的拖延態度的。在卡普里維上台以後，在這兩方面的政策都發生了轉變，隨着政策的轉變，同時也進行了海軍的擴充。

這種新政策使英國人大吃一驚。在他們看來，他們的印度屬地現在所受到的強大的德國的威脅，遠遠超過俄國的威脅；德國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並且同奧地利以及同毗鄰奧地利的土耳其有極其密切的關係。英國政治家早已看到一條直通的鐵路綫，從柏林穿越奧地利和土耳其統治地區，達到薩羅尼加、君士坦丁堡和巴格達；利用這條鐵路綫，隨時都可以用優勢的陸軍來進攻埃及，也就是進攻通向印度的道路，甚至通過波斯來進攻印度本身。對德國的恐懼心便產生了，同時也產生了對俄國的友情，這種友情恰恰在英國以前最堅決反對沙皇帝國的人士中間，也就是在保守黨人中間最為強烈；保守黨人是最重視在軍事上統治和保護印度的。

不是蘇丹或剛果，不是南非，不是摩洛哥，也不是中國，而却是土耳其，現在成了風雲變幻的根源，一場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暴風雨正威脅着要從這個根源爆發出來。

但是這場暴風雨也被避免了。正如在中國和印度以及在埃及和波斯那樣，帝國主義時代也在土耳其，以它所引起的變化，尤其是以人們預料它行將引起的變化，喚醒了民族生活的開端，當然這種民族生活還帶有相當軟弱的性質。土耳其不像中國和印度那樣擁有許多知識分子，它也沒有民族的城市資產階級。在土耳其，城市資產階級主要是由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組成的；即使按他們的國籍來說他們不是外國人，但他們總還覺得自己是異國人。

作為一個軍事國家的土耳其的典型特色尤其表現在：土耳其政治革新的嘗試都是由軍官集團來發動的，軍官勢必要了解歐洲的知

識，如果軍隊要在某種程度上符合需要的話。在認識到如果要使土耳其不亡就必須徹底改變國家情況的土耳其各種分子中間，唯有軍官集團才有力量來實現變革。1908年的土耳其青年革命就是由軍官發動的，這次革命使土耳其有了憲法和議會。

在這裡來敘述形勢今後將如何進一步發展，這是離題太遠了；這種形勢先導致了奧地利的正式兼併波斯尼亞，從而對最近巴爾干半島上的大變化，對巴爾干聯盟的成立以及對反土耳其戰爭給予了最初的推動。

這起先看來就會燃點起一場世界大戰，但是大戰又一次被拖延下來了。最初顯得是一場可怕的恐怖悲劇的阿爾巴尼亞，變成了一場最令人高興的短歌劇。反土耳其戰爭不但沒有燃起普遍的世界戰火，反而促成了一種便於德國同英國進行和平商討的形勢。因為它割斷了土耳其與奧地利之間直接的領土聯繫。現在，在這兩國之間，建立了一層獨立國家的屏障。因而，甚至對最為憂慮重重的英國人來說，巴格達鐵路以及德國資本在土耳其的影響都根本喪失了它的威脅性質。我們現在知道，德國和英國之間的一項協定幾乎等於締結了，這項協定消除了土耳其問題上的一切爭端。目前的戰爭却阻礙了這個協定的簽字。這場戰爭是在不存在任何帝國主義爭端的時候爆發的。

目前戰爭的起點是奧地利與受到俄國支持的塞爾維亞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不以任何強烈的帝國主義動機為基礎。塞爾維亞距離任何帝國主義傾向都還遠得很，它還處在正在形成民族國家的階段中。俄國的擴張性的努力，是我們已經了解的，這就是東方專制主義的、軍事官僚國家的、在世界市場上沒有競爭能力的工業的、爭取在地中海獲得海口的努力，這一切都屬於帝國主義以前的性質。在俄國，還談不上資本輸出，它還很需要資本輸入。它與其說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擴張努力的主体，還毋寧說是這種資本擴張努力的對象。

奧地利也還需要資本輸入。誠然，奧地利的工業正在爭取獲得

新的市場，它有时还发展一些可以被称为帝国主义要求的傾向，因为它希望奥地利向薩罗尼加擴張。但是这种要求很久以前就停止了。这不是出口工业的需要，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需要，这种需要引起了与塞爾維亞的矛盾。

毫無疑問，可以有理由說，战争的东欧起点不是帝国主义的。东欧还远远沒有达到由帝国主义需要来支配其政策的程度。

而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西欧並沒有因任何帝国主义爭端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集团。这些爭端都已經解决了。

己 世界大战

乍看起来，目前的世界大战因此不是帝国主义战争。然而，它毕竟还是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只是在后来才如此的。既然帝国主义是軍备竞赛的动力，那末就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主义已經应对战争灾难負有罪責，軍备竞赛后来当然使所有的大国都陷于它的魔力支配之下，不管它們是否都是被帝国主义动机所驅使的。这种軍备竞赛如果不加以制止，就必然会成为战争的原因，即使能够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来消除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爭端的話。

事实上，如果我們密切注意从奥地利向塞爾維亞发出最后通牒到战争爆发之間这个期間事态的发展，那末我們就会发现，战争情緒不是由于被一方提出而被对方拒絕的任何領土或經濟要求而燃起的，而完全是由于相互动員这个事实而燃起的。因此，战争責任問題变成了各国动員令的日期和性質問題。这些国家为了确保和平而建立起来的出色的防务，在这些国家首次試图建立它的时候就已經把这些国家拖入了战争。

由于这种特殊的根源，战争就具有特殊的性质。假若这次战争是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爭端而燃起的，是由于摩洛哥之類的问题而引起的話，那末人民的战争热情就会很低，对战争的反抗就会很大。我們應該认为，任何帝国主义分歧之所以直到現在还都不能直接燃起战争，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要归功于上述考虑。作为軍备竞赛后果

的战争，却是另一回事。这种军备竞赛本身，由于它愈来愈沉重的负担，很久以来就使得人民群众——在他们还没有认识清楚以前——产生了对外国越来越强烈的憎恨，他们把军备竞赛负担的产生归咎于后者。随着军备的扩大，对于预期中的敌国集团的猜疑也愈来愈厉害，因为，如果不是打算完全灭亡对方的话，怎么会集中如此巨大的权力手段呢？动员和战争于是就使这种情绪高涨到沸腾的程度，并且由于缺乏任何一方面的任何特定要求，使各方面都害怕在失败时遭遇最悲惨的结局，因而就造成了一种要本国军队获胜的火热般的狂热情绪。

这种情绪里本来并不存在对帝国主义的狂热；对于群众说来，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关联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却无可讳言地帮助导致了帝国主义倾向长驱直入地传播到我们党的队伍里来，这种倾向的萌芽当然好几年以来就已经存在了。

在由于军备竞赛和动员而产生的战争特殊根源中，不仅存在着各交战国的普遍战争狂热的原因，而且还存在着结束战争的重大困难。

在其他情况下，战争的爆发通常是因为两个主权国家不能就一定的要求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所以必须用武器的力量来较量一番。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涉及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西方国家和奥地利是否愿意许可俄国在牺牲土耳其利益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张；在1859年的战争中，涉及的问题是奥地利是否应该维持或丧失它在意大利的地位。同样，1864年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为此而发生：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是否可以继续是丹麦的领地；1866年的战争是为此而发生的：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应该归谁；哈布斯堡家族对于德意志各邦的事务是否还应该有些发言权，还是应该让普鲁士成为德意志各邦中间唯一的大国。最后，1870年的战争从一开始在实际上——即使不是在形式上——就涉及这样的问题：法兰西帝国是否有权阻挠德国的统一。在几个星期之后法国溃败时，这个争端就已经解决了。法兰西共和国既没有阻挠德国统一的力量，也没有这

样做的意願。这时出現了一个新的战斗目标：要求割让亚尔薩斯—洛林。

这些都是为之而战的完全特定的、从一开始就是有限的目标。

今天(二月底)，战争已經进入第八个月，任何一个交战国的政府都完全无从知道，它是在为了什么要求而战。它們都是为胜利而战，都是为持久和平而战，但是还没有一个政府是为特定的要求而战。

所以，在現在，事物是按照着与通常相反的进程发展着。通常，各国首先确定要求，然后宣战，接着进行动员。这一次，不是为战争而宣布动员，而是为了动员而宣战，而且，为之而战的目标的确定，要看战争結局如何而定，而且人們要强迫敌方答应这种目标的实现。

怎么能用这种方式来获得和平呢？只要战争不是为了一定的要求而是为了一种沒有限度的含糊的恐惧，那末各方为了不被击败就要使出它最大的力量。假若它能清楚地知道对方向它要求什么，那末它也許会发现，繼續进行战争——即使它会战胜——比起就已經提出的要求达成協議来，会使它遭受更大的損失。

直到現在，各国只有私人的輿論談到媾和的条件。在这些輿論中，我們主要討論一下社会主义者的輿論。其中某些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外国的乘胜入侵可以給一国的人民带来自由。法国同志相信，法国的胜利会給德国带来一个民主的政权，而德国同志也設想，德国的胜利会带来沙皇制度的崩潰。以前的战争，尤其是 1870 年的战争，像一个实例似地浮現在人們的脑海中：法国在 1870 年的战争中由于战敗而成为共和国。

但是这个共和国不是由战胜国带来的。俾斯麦决不欢迎共和国。共和国是为了有力地抵抗入侵者而建立的。因此，它是很得人心的。如果战胜的德国在 1871 年把共和国强加給法国人，那末共和国就显得是祖国敌人的工具。沒有任何东西可以更使共和国名誉扫地的了。

恩格斯在他 1892 年发表的关于《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新时代》第十卷第 580 頁起)——这篇文章近来常常被人引用——中认为

这是很可能的：与俄国人结成同盟的法国人的乘胜入侵德国，可以带来一种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大变革，但是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发生：即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正如 1793 年法国激进共和党人那样，比资产阶级政党更有力地抵抗入侵的敌人。

我们这一次不用估计到这种可能性。把交战国一方干涉另一方的国内局势作为和平条件或胜利目标，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各国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就所有已经发表的而言——完全是另一类型的。这些条件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驳斥过。这种意见一致，十分出色地证明了国际（指第二国际。——译者注）的内部精神团结还何等地强有力。一致主张共同的和平纲领，就必定成为更进一步巩固这种团结的最好手段。

国际的和平纲领当然不是从交战各国的力量对比关系，不是从目前的或者可以预期的战争形势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无产阶级运动长远的和共同的需要以及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的。这两种需要是一致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国际社会主义的和平纲领——在交战各国中，英国的独立工人党是迄今最强烈主张这个纲领的——集中在下列两点上：反对任何兼并，这就是说非经有关居民的同意不作任何领土变更，以及裁减军备。

关于第一点，几乎没有什么还需要讲。它也不需要任何评论。我们当然不会站在维持现状的立场上，我们并不认为，国家的疆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偶合而形成的疆界，千秋万世地永远不得加以触动。

但是，我们的民主观点不许我们用除了民主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来争取实现民族生存条件的改变。我们还已经指出，把一个已经超出原始民主阶段的并且已经普遍全面和活跃地参加全国政治生活的民族，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强行纳入一个新的国家联盟并且把它保持在这个国家联盟里，这将引起何等严重的弊害，甚至危险。企

图这样做的国家，不但会遭到被兼并民族的强有力和不屈不挠的反抗，而且还会遭到一切民主国家以及各国的一切民主阶层的不信任，甚至痛恨。这样就会使它的国内外局势恶化到极严重的程度。这种兼并会更严重地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这种兼并将使阶级矛盾有一部分遭到掩盖，有一部分遭到窜改。

拒绝任何兼并，这是从我们党的民主性质中产生的，同样也是从现代人民生活的民主感情所已经获得和正在日益增长着的力量中产生的。

而裁军的要求则是作为战争的理所当然的后果而产生的。正如以上已经指明的那样，战争是军备竞赛的产物。军备竞赛在战前就已经使各国处在最沉重的财政负担的重压之下；这种负担在战后，即使不增加，也会单单由于战争所需的以及治愈战争创伤所需的巨额财政开支而加倍地难以承担。但是军备的负担决不会停留在与战前军备相同的数额上，而会迅速地进一步提高，除非使整个制度停顿下来。军备竞赛的负担愈大，下一次战争的危机也就愈大。

这种前景是如此的可怕，以致于也许没有一个政府不打算在媾和时争取实现一种要强制实行裁军的条件。但是，如果裁军是片面地强加给战败国的话，那末裁军就具有一种与作为共同准则根据互相协议而产生的裁军不同的性质。作为前一种的要求，裁军就会意味着较弱国家的竭力反对，就会意味着战争的继续，直到完全毁灭。反之，如果自愿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这就会尽快地促成媾和，并且结束可怕的屠杀和破坏。只有关于裁军的普遍协议，才能具有持久的性质。反之，片面地强加于人的裁军，就会使战败国不断地要求尽快摆脱这种贬低其地位的义务，而不择手段和同盟关系。这样，和平就只能是一种休战，是复仇战争的准备。

当然，我们的裁军不应该理解为完全解除武装。当我们某些在小国的同志要求实现完全解除武装时，他们是以其特殊处境作为理由的；他们认为，这种处境使他们对外国侵略进行的抵抗毫无前途。

对这种要求应该承认到什么程度，要取决于对这些国家的特殊条件的理解如何，这与我们的原则毫不相干。我们党的纲领并不要求废除一切军队，而要求“用人民国防军来替代常备军”。

裁军的要求首先是一种经济上的要求。它要求限制国家在军队方面的开支。这种限制可以通过各国之间的协议，譬如说通过把各国在参战时的经常性陆军海军预算削减一半的协议，加以确定。这就意味着大大减轻国家的负担，而且也不使任何一个国家变得毫无国防，甚至决不会使军备方面的竞赛停顿下来，而只使它具有另一种形式。在军备竞赛中，将不再根据谁的钱多而决定胜负，而根据谁的头脑清晰，根据谁能够在组织上和技术上用有限的资金比别人做得更有效而决定胜负。这样，军备竞赛就丧失了它最恶毒的芒刺：那种激怒各国人民的日益增长的财政负担。

当然，这并不因而就提供了维持和平的完全保证。我们不能在以矛盾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范围内指望这种保证。但是这消除了最严重的战争根源，便利一切对和平感兴趣的阶级来维护和平，并且促成了战争创伤的迅速治愈。

因此，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好几年来一直十分重视这个要求。只有抛弃帝国主义的方法，才能实现这个要求。

五 貿易協定

不論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会形成怎样的力量对比关系，也不論战后出現的和平局面会具有何种形式，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帝国主义已經发展到危机阶段。現在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不就是自己成为主人，并本着上述精神来規定和平条件。要不就是帝国主义因素占上風，而使和平条件失去其意义。那样全世界就将被各資本主义强国所瓜分。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迄今为止，它一直力求通过占領所謂无主地区来进行扩张，这就是說，在占領那些尚未被其他資本主义国家所并吞的原始民主地区。任何这类占領虽有可能，但却并不一定会引起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冲突从而爆发一場世界大战。

假如战后一切还“无主”的地区都被瓜分掉了，那末任何資本主义国家的任何进一步扩张都将只有通过侵犯別人的領地，也即通过战争才有可能。从那以后，帝国主义的任何扩张努力从一开始起都将意味着寻求战争的努力。战争将不再像以往那样是这类扩张努力所引起的一种也許确非所願的后果，而将直接是这种努力的目的。

正像在漫无限制的財政基础上繼續进行的軍备竞赛一样，这将意味着战争危机的无限增长。如果在媾和时这种傾向占了上風，它就会導致这样一种局面：战争仅仅由于精疲力尽而暫告中断，每当元气恢复时又会引起一場新战争。

于是只剩下了这两种选择余地：要不就是世界和平获得更大的保障，要不就是它遭受更大的威胁；要不就是持久的和平，要不就是长期的战争局面。战前局面的单纯重演已不再可能。只能是改善或是恶化。鉴于这种前途，似乎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在前一种意义

上起作用的傾向將會在居民群眾中得到越來越廣泛的贊同。無論如何，我們都沒有理由用下列做法來使我們的事業受到損害：即我們从一开始就斷言，除了引起長期的戰爭局面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戰爭結局；一切其他的結局都是幻想。

不管戰爭的結束實際上會採取何種形式，我們的黨越有力地堅持其和平綱領而不去考慮實現這一綱領的前景如何，那麼它就越能贏得群眾的信任和建立更加強有力的國際團結。

認為我們在這方面與經濟發展的需要相矛盾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這一點已經由以上的論述足夠清楚地說明了。

我們已經看到，如今各國的擴張努力決不完全取決於工業資本的需要；另外我們還看到，正是在那些對於資本最為重要的農業區里，這種擴張努力最好不用帝國主義的暴力方法，而用和平民主的辦法來實現。

還可以補充一句，國家疆域的擴張決不是用以擴大商品輸出或資本輸出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手段。我們已經用德國在非洲的屬地來說明，殖民地在德國的貿易發展方面，在其工業品出口和原料進口方面佔據着多么微小的份額。整個殖民地的數字也說明同樣情況。在1913年的特殊貿易中，德國的出口總值共達一百一十億馬克（確數是10,770,300,000馬克，其中436,400,000是黃金和白銀）；它的出口（原文如此，疑為進口之誤。——譯者注）共值一百億馬克（確數是10,196,500,000馬克，其中101,400,000為金銀）。同時，德國從它的殖民地輸入的商品總值只達五千三百四十萬馬克，向它的殖民地輸出的商品總值也只有五千四百一十萬馬克。與此相反，1913年德國從英國及全部英屬地輸入的商品總值超過二十億馬克（2,202,000,000馬克），對它們的出口總值也達到近二十億馬克（1,891,200,000馬克）。從英國一國輸入的總值就達八億七千六百萬馬克，向英國一國輸出的總值為十四億三千八百萬馬克。

人們可以看到，對於德國工業來說，究竟是同德國殖民地的貿易更重要呢，還是同英帝國的貿易更重要。

尽管英国的殖民帝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国家中不仅幅员最广阔，而且在工业品进口、原料供应和资本进口等方面也都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然而对于英国工业来说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即使它在实际上并不那么显眼。1912年英国的进口共值七亿四千五百万英镑（折合一百五十亿马克）。其中来自英国各属地的只达一亿八千六百万英镑，即只占全部进口的四分之一。出口共值六亿英镑（折合一百二十亿马克），其中只有一亿九千一百六十万英镑，即三分之一是输往英国殖民地的。如果人们只考虑到英国一国产品的出口，那末殖民地所占的比重将会大一些。它在四亿八千七百万英镑中占一亿七千七百万英镑。但是不管怎么样，甚至英国贸易的绝大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同它的属地，而是同外国进行的。

英国从德国的输入大于英国从其最重要殖民地印度的输入——前者是七千万英镑，后者是五千二百万英镑；它在1912年对上述两地的出口数额一样，对德国的出口是五千九百六十万英镑，对印度出口是五千九百七十万英镑。

1912—13年度英国的棉花消费量是三百八十二万五千包，其中来自东印度的仅四万八千包，来自埃及的只有三十五万一千包，而来自美国的共达三百二十八万二千包。人们可以看到，它的属地对它的原料供应所起作用是多么微小。那些并非其属地而且永远也不会成为其属地的地区，在这方面所起作用却重要得多。

英国的殖民地对于英国资本输出的重要性要超过对于商品输出和原料供应的重要性。然而即使是在这方面，对外国的资本输出也仍然占着优势。在从1905年到1913年的九年間，英国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以股份资本的形式）共达五亿三千九百六十万英镑，而对外国的资本输出为七亿五千八百万英镑。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这方面英国殖民帝国显示出完全例外的情况。在英国属地中，输入工业产品最多、提供工业原料最多、输入资本最多的地区在实际上恰恰是联邦国家，它们不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殖民地相提并论。当人们想要一般地考察殖民地对宗主国

的工业和資本的影响时,應該不把它們考虑在內。

还應該考虑到另外一点。当人們列举对殖民地的貿易数字时,这些数字絕不說明:因为它们們是殖民地所以才同它們进行貿易,或者說必須把它們作为殖民地加以占領才有可能同它們进行貿易。

讓我們举埃及为例,它是在 1883 年完全落入英国控制之下的。英国对埃及的貿易是否因此会比埃及仍然保持独立时增加得更多呢? 这一点当然不能确切地肯定,但是下列数字可以提供一些迹象。(单位:百万英鎊)

英国从埃及的进口		英国的全部进口
1872.....	16.5	354.7
1912.....	25.9	744.9
增加 9.3=56%		390.2=111%
英国对埃及的出口		英国的全部出口
1872.....	7.3	314.6
1912.....	9.6	599.6
增加 2.3=31%		285.0=90%

这就是說, 英国对埃及貿易的增长还赶不上英国貿易总額的增长。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作这种假設: 如果沒有对埃及的軍事占領而只是凭借經濟因素的影响, 英国对埃及貿易的增长就会更少些。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通过殖民地来使它的工业在原料供应和銷售方面不依賴外国,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怀有这种梦想的帝国主义者只能暴露他們的显然无知。一个国家的工业越发达, 它就越要依賴世界所有地区来取得其原料和銷售其工业品。甚至像英国这样一个龐大的殖民帝国, 如果不从像俄国和美国这样一些国家取得原料, 它的工业就无法繼續存在下去, 而这些国家是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之变成殖民地的。英国1912年从美国一国的商品进口額就几乎等于它从其龐大的殖民帝国进口的商品总額。它从美国的进口总值达到一亿三千五百万英鎊, 而它从全部英国屬地的进口总值为一亿

八千六百万英镑。在 1907 年，英国从海外输入了二亿零四百万英镑的原料。其中只有四分之一多一些来自英国属地（五千八百万英镑），其余将近四分之三（一亿四千六百万英镑）来自外国。

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为了在原料供应上能不依赖外国而争取成为一个殖民帝国的任何努力，都必然会使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必然会使自己卷入无穷无尽的、耗尽人力财力的战争，而却又并不能接近自己的目标。这种政策将是一条最肯定无疑地一定会把国家整个经济生活导向破产的道路。

征服决不是尽可能地充分保证工业取得原料的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极迅速地发展各农业国家的生产力，最重要的农业国家是不会变成殖民地的——不论是俄国，或是阿根廷，或是美国，或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或是不久以后的中国，都不会变成殖民地；同时，印度和埃及将不会再忍受宗主国关系上的任何变换，而只肯将英国的统治换成完全的自主。

向这些地区，而不是向本来的殖民地区输出资本、建造铁路和灌溉工程、促进更高度精耕细作的农业，这些才是提高它们的生产率以便尽可能满足资本主义工业日益增长的原料需要的最重要途径。

对于这种工业来说，在生产场所和农业地区之间进行最频繁的交流也是同样重要的；这种良好的联系将便于向农业地区输出商品和资本以及从它们输入原材料和原料。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途径就是签订一种尽可能近乎自由贸易的贸易协定。其中一方面规定取消任何会使工业原料涨价和会使工人实际工资降低从而降低工业生产力的农产品关税。另一方面它规定取消任何会使农业生产资料涨价的工业品关税。

这种贸易协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办法；同时也是实现和保障世界和平的最有效手段。

当然，如果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论者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经济矛盾的话，那是他们的幻想。自由贸易和民主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大家都关心要使这种矛盾的对抗采取一种

給劳动群众带来最少牺牲和苦难的形式；而这一点的实現在自由貿易和民主的情况下，比在农产品保护关税和警察国家的情况下要更容易得多。

除了拒絕一切强加于各国人民的暴力兼并和爭取普遍裁减軍备之外，社会民主党的和平綱領中还包括了关于簽訂貿易协定和尽量降低关税的要求。

六 关稅同盟和国家联盟

在媾和时，关稅問題还具有另一重意义。这样我們就又回到了我們探討的起点，回到了国家的擴張問題。这一問題据說已經成了欧洲諸国的迫切任务。对它們来說，民族国家的范围已經不够了。

这里面包含着不小的一点真理。强大国家的形象已經出現，不列顛帝国、俄罗斯帝国、美利坚合众国，——中欧各国應該怎样在这些强国旁边維持存在呢？

这三个第一流大国（不久中国也将以平等地位躋入它們之列）的面积对它們本国工业的增长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并非像人們所設想的那样是因为这三个大国都能在經濟上自給自足（这一点它們誰也做不到），而是因為它們都向本国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場；这样的市場給工业奠定了基础，使它得以在这种基础上組織起巨大的康采恩；这些大康采恩能够以最强大的財政力量和巨型企业所具有的种种工业优越性来在国内外从事竞争。中欧的工业也需要有这样一种广闊的国内市場作为其坚实的基础，如果它要同別国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竞争的話。迄今为止，德国的国内市場还一直能对它的工业提供足够的基础，供它在世界市場上順利地擴張經濟势力。这种情况开始在发生变化。不仅对于德国工业而且对于邻国的工业来說，它們当前最迫切的問題正在于此，而不在于获得新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在于把民族国家扩展成多民族国家呢？这就等于說，資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同民主的需要背道而馳的；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样，民主只有在民族国家里才能获得最完美的表現。无产階級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放，它在任何情况

下都决不能放棄民主。于是它就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要不就必须努力阻撓經濟的发展，要不就只有用阻撓政治发展的方法才能促进經濟发展。

但是幸好这种局面并没有出現。通过征服毗邻的其他民族地区来把民族国家扩展成多民族国家，仅仅是扩大国内市場的途徑之一；这一途徑所要求的代价和所包含的危險都最大，它同广大群众的民主要求完全背道而馳，它阻撓政治的发展，而且朝这个方向走得越远，其所引起的内部和外部的反抗和摩擦也就越多。

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采取一个村社不断壮大和并吞毗邻各村社的方式，而采取各村社联合組成一个共同体的方式；在这个共同体里，各村社都依然处于相互平等的地位，并且保持着处理村社事务的自治权。

扩大国内市場的最好和最有前途的办法不在于把民族国家扩展为多民族国家，而在于把各个具有同等权利的国家联合成国家联盟。大帝国的形式应该是国家联盟，不是多民族国家，也不是殖民国家；这种大帝国是資本主义賴以达到其最后的、最高級形态所需要的，而无产階級将在这种最后、最高級形态中夺得权力。

这种联盟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它可以是一个由若干联盟組成的联盟。它表现为这样一种富于伸縮性的国家形式，它可以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最終可以一直发展到世界联盟。

美利坚合众国已經組成第一个这样的联盟。不列顛帝国之所以强大，应归功于及时把它的最强大和发展最快的殖民地变成联邦。要使俄罗斯帝国变成一个民主的社会，就必须同时使它从一个中央集权的統一国家变成一个由若干自治民族国家組成的联盟。

奥地利也面临着类似的問題。但是，对于那些位于英国和俄国之間的所有欧洲国家來說，却有更紧密联合的必要。

德意志帝国同它的邻国組成一个关稅同盟，会成为欧洲合众国的起点。

这是一个可喜可賀的目标，但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实现它呢？

有人提到 1833 年在普魯士领导下为准备建立德意志联邦而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中欧关税同盟的目前这些贊助人却往往忘記注意到：德意志关税同盟只有在自由貿易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立并且发挥作用的。它所規定的关税是最低限度关税；它对于德国工业发展的巨大作用不在于排除外国，而在于消除国内貿易的一切限制和障碍，从而創造了德国工业所需要的国内市場的广泛基础。

只有在自由貿易的基础上，德意志关税同盟才得以成立。

对任何产品所征收的任何較高的关税，固然有利于这个国家的生产者，但却不利于它的消費者。如果这种产品是一种生产資料，那还会損害其他生产部門。因此每一項关税都会促使受其影响的各生产部門要求补偿由于提高对本身产品的关税而受到的損害。要实行任何保护关税，都会使各工业部門竞相爭取立法因素方面的优待。要同样滿足所有部門，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通常最多只有那些在政治上势力最大而且大多也正是經濟上最强大的部門才能获得发展。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各个生产部門，而且还适用于依靠这个或那个工业部門的情况来决定其本身繁荣与否的地区。在这方面，也是那些最强大和最有势力的才最有前途。保护关税本来应该用来保护弱者，可是它却使强者在牺牲弱者利益的情况下享有特权。

因此，凡是規定較高稅率的关税，都会产生一种最終只有依靠国家暴力才能加以解决的矛盾，它們与自願協議恰恰相反。

就因为这一点，德意志关税同盟要建立在保护关税的基础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同时，普魯士的对手奥地利也企图建立一个把全德国和奥地利都包括在內的关税同盟，但却建立在保护关税的基础上。这个計劃因此就失敗了。奥地利只有依靠单独实行保护关税，它因此就同德国的其他部分隔絕开来，并且从而为它在政治上脱离德意志联邦作了准备。

今天的情况也并没有什么不同。的确，德国正面临着决定命运的时刻——这里特地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就如此經

常被使用的字眼。德国需要扩大它的国内市场，这就是说，需要取消德国和邻国之间的一切贸易限制和关税限制。但是，如果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在自由贸易式的关税基础上才有可能。只有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欧洲各小国在缺少巨大国内市场方面的缺陷。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放弃这种基础。

然而仅仅有自由贸易还不足以解决问题。经验教训我们——而且很容易证明为什么必须如此，在民主日益发展的时代，不同的国家若要长久地结成一个共同体，那就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也即所有参加国都有民主的要求和民主的局面才有可能。当十八世纪末叶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的时候，它所以能组成一个自愿结合的联邦，那只是因为它的整体和局部都是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我们已经看到，大不列颠各联邦国家联盟是如何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成为可能的。它的扩展要取决于英国本部的民主分子对于英国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家的控制能够达到何种程度。

要成立德意志帝国，不仅需要建立自由贸易式的关税同盟，而且还需要有关于实行普遍而平等的选举制度的民主特许来作为准备。

人们所渴望建立的中欧关税同盟或甚至国家联盟，其成立目前也同样将取决于各成员国国内的，特别是作为结合中心的核心国国内的那些主张自由贸易和充分民主的阶级和政党能够献出多大的力量。帝国主义政策是德国工业发展不能获得其急需的进展的最严重障碍。

对内政策足以影响对外政策；反过来，对外政策也足以影响对内政策。两方面中的一方面也可以迫使另一方面发生改变。尽管世界大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改变，而且战争的后果可能引起这种改变，然而它却不需要使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发生任何改变。相反地，社会民主党从来就主张并且一直到今天还独一无二地全力主张下列这一切要求；这些要求的实现将使战争以持久和平而告终，赋予所有参战国以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气氛和前景，并把德国及其邻国提高到更高级的国家存在形式。这些要求是：放弃一切征服政策，裁减军

备，国与国之間在貿易和接近方面享有最大自由，实现民主；这一切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意志最主要的基础。我們只須繼續忠于我們自己，以便爭取德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所能期望的結束这次战争的最美好的結局。

在这方面，我們的下一个成就不仅取决于我們自己，而是取决于战争結束时的力量对比关系。但是不論真正的和平会具有何种形式，我們越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們的綱領，越是不使我們自己背离这个綱領，越是有力地維護它，我們就越能在战争結束后获得劳动群众的信任，获得所有爭取各国人民的持久和平与持久幸福的人士的信任。

人們不應該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任务所显示出来的表面矛盾而产生錯觉。社会民主党有責任在資本主义的条件下保卫无产者的利益，对資本主义进行斗争，但同时又要促进經濟的发展；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立的期間，这种經濟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促进資本主义。我們在对它进行斗争的同时却又要去促进它。这怎么可能呢？

这种可能性在于：有各种不同的促进資本主义的方式。資本的动力是利潤——“沒有利潤就不会有烟囱冒烟”。利潤增殖，这是資本主义的口号。这种增殖可以通过两类方法来实现：一类是通过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工人生产得越多，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超过他的生活費用就越多，人們可以从他身上榨取的东西就越多，利潤也就越大。另一类方法是：单纯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东西，而不去增加他的生产力。在这两类方法中，第二类方法是最方便，最垂手可得和最廉价的。它既不需要新的开支，也不需要多費心机。它只需要权力。属于这类方法的有：压低工資；延长劳动時間；提高食品价格（例如用征收間接稅或农业稅的办法）；提高房租或提高不是租給資本主义租地人而是租給工人自种的土地的地租。

属于第一类方法的有：采用新机器；改善生产和企业的組織形式；用較先进的經營方式来代替較落后的經營方式；用大企业代替小企业；建造或改进交通工具；提高工人教育水平和增强工人体力；科

学地安排生产过程。

第二类方法由于资本的較快增殖可以暂时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作为最重要生产资料的工人的贫困化，它們最終必将阻碍经济的发展。第一类方法中的某些手段可能也会使工人阶级暂时受到很大的痛苦，但是它們却能准备好一种物质基础，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劳动才能賴以解放。第二类方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会損害工人的利益；实行了第一类方法，則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日益提高，尽管剝削不断加剧，但却不仅可以使资本家，而且也可以使工人在物质方面都有所改善。

我們不能也不該妨碍第一类方法中各种手段的实行。我們只能力求在这些办法实行时不但不致損害工人，而且还要让工人分享革新的好处。

与此相反，我們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第二类方法中各种手段的实行。工人的抵抗越强有力，在这方面资本遭到的障碍越大得无法克服，那末资本就越会被迫流向那唯一仍然向它敞开着使它得以賺取利潤的另一条渠道，即提高劳动的生产力。

通过这种方式，社会民主党就解决了历史任务的表面矛盾：它一面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又促进资本主义。

这一点也可以适用于帝国主义問題。按照我們的論述，对这一点已不再可能有任何疑問，即当帝国主义企图用暴力手段来压迫和剝削农业国工人的时候，它总是实行第二类方法的。这种手段可能会暂时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最終它会变成阻撓经济发展的手段。

纵然帝国主义并不直接针对本国工人，而是针对外国工人，也即一方面针对它所占据的殖民地的工人，另一方面针对被它看作是爭夺殖民地时的竞争对手的其他工业国的工人，然而，对工人阶级來說，帝国主义的危險性并不因此稍减。帝国主义对本国工人这样說：他們自己会从对殖民地工人弟兄的加紧剝削中得到好处，而其他工业国家里的工人同志則由于妒忌他們这种好处而成了他們的敌人，因此必須用暴力对待这些敌人。最富于欺騙性的莫过于获得这种好



2 025 5569 9

处的前景了：那些在外国被弄得一无所有的工人恰恰作为压低工资的人而到资本主义国家来。作为这种工人，他们就面临着受到当地工人敌视对待的威胁。因此，甚至对于老大帝国里由于帝国主义而获得所谓特权的工人来说，帝国主义的最終目标也只能是加紧压低工资和工人阶级分裂为敌对的队伍以及妨碍工人的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用小恩小惠来进行引诱，以便使工人背棄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瓦解他们的国际团结；这种小恩小惠即使能够兑现，也只能是极其短暂的，而且必然会以劳动阶级受到极大的削弱和承受最沉重的负担而告終。

因此，对帝国主义必须像对压低工资、对延长劳动时间和对用捐税来提高食品价格等做法那样地进行坚决的斗争；目的不在于阻撓经济进步，而在于迫使资产阶级在扩大利润、扩张剥削地区以及增加工业品出口和食品与原料进口时，不再采用最容易和最方便的帝国主义方法，而采用那种无疑需要更多理智的民主方法和自由贸易方法；这种方法将替经济的发展开辟最广阔的前途，但同时又会在体力上、精神上和政治上加强无产阶级。

再错误也莫过于这种意见了，即认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不许人们在资本还居统治地位的时候反对帝国主义的方法。恰恰相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把这种反对看作是当代工人阶级最重要的任务。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

作者 = 卡尔·考茨基

页数 = 82

SS号 = 10283547

出版日期 = 1963年02月第1版

前言

目录

一 关于民主和关于民族国家的若干问题

二 帝国主义国家的必然性

三 国家扩张要求的原因

四 帝国主义的各种类型和目标

甲 不列颠国家联盟

乙 东印度

丙 非洲

丁 中国

戊 土耳其

己 世界大战

五 贸易协定

六 关税同盟和国家联盟